

# 前哨

QIANSHAO

列宁格勒印刷工厂工人理论小组

二〇二二年五月

4



# 前哨

月刊

列宁格勒印刷三厂工人理论小组 编辑出版

二〇二二年 第四期

## 目录

|                             |           |
|-----------------------------|-----------|
| 国际联合声明：红色五一万岁! .....        | 1         |
| 关于帝国主义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    | 3         |
| <b>◎原著选读 .....</b>          | <b>5</b>  |
| 列宁：怎么办？（节选） .....           | 5         |
|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         | 14        |
| <b>◎社论 .....</b>            | <b>16</b> |
| 什么是“互利共赢”以及它如何剥削全世界人民 ..... | 16        |
| 工人课本 .....                  | 18        |
| <b>◎转载 .....</b>            | <b>23</b> |
| 中俄两帝在侵乌战争中的新“神圣同盟” .....    | 23        |
| 特色帝国主义国际国内的典型景象 .....       | 25        |
| 牛马一生：养老问题与资本时代的社会再生产 .....  | 27        |

## 声明

欢迎各位读者向以下两个电子邮箱：[leningrad3rdprinting@protonmail.com](mailto:leningrad3rdprinting@protonmail.com);  
[leningrad3rdprinting@tutanota.com](mailto:leningrad3rdprinting@tutanota.com) 投稿自创文章或者提出意见。使用 Protonmail 和 TutaNota 是为了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而为保证您自己的安全，请不要使用国内的写作软件或者电子邮箱服务进行投稿。请从 <https://lenin3print.github.io/> 获取最新和以往每期《前哨》月刊。每期发刊时，页面上将会增加新一期的下载链接。

---

## 毛主席语录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名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

# 国际联合声明：红色五一万岁！

联合签署：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土耳其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利西亚毛主义共产党建设委员会；意大利毛主义共产党；尼泊尔共产党（革命毛主义）；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永恒火焰；El Kadehines 党-突尼斯；毛主义革命联盟-斯里兰卡；挪威革命共产党人(RK)；不列颠革命集体(前红色之声传媒)；伊朗红色道路毛主义小组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马列毛主义力量的当务之急是利用国际上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摧毁到处破坏的帝国主义，建立没有战争的社会主义！**

五一节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表达其斗争决心的日子。在这一天，无产阶级评估其争取自由、独立、平等和主权的力量平衡，并更加坚定地动员其全部力量进行不懈的斗争。在这一天，它为自己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作出保证。在五一节之际，我们向正在与帝国主义进行不懈斗争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致以红色敬礼。

破坏世界、环境和人民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只在持续的破坏中保持活力。帝国主义制造了破坏性的新冠病毒，作为全球化政策的一部分，它正在重组经济，以克服其经济金融危机，并将整个负担放在人民身上。它与亚非拉落后国家落后国家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合作，以资本和技术的名义，通过强行的不平等条约，肆意掠夺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市场。然而，它似乎并没有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萧条、通货膨胀和失业加剧了。人民的整个生活包括健康和教育都处于危机之中，他们面临着极端的困难。贫富差距正在扩大。依赖于战争的美国经济正在世界各个角落煽动无数的战争，以攫取超额利润，并在出售武器。生活变得可怕，而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正在支持法西斯势力来镇压他们。由于帝国主义采取的破坏性政策，国际和国内的基本矛盾正在加剧，因此革命的条件正在演变。

## 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之间的矛盾

一些落后国家的人民正在大胆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全球化，反对那些不提供就业、教育、卫生和其他基本设施并导致价格飞涨的政府。被压迫民族正在与镇压民族的行为作斗争。在过去 20 年里一直压迫着阿富汗的美军的撤离是过去一年里的重要进展之一。美国在 2021 年在阿富汗面临失败，就像 1975 年在越南面临失败一样。这些发展表明，如果人民以坚定的决心进行斗争，现代帝国主义军队就得收手。例如在印度，各种被压迫阶级、阶层、部落和被压迫民族正在进行战斗的斗争，反对婆罗门印度教莫迪政府企业赞助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工人们正在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反对取代劳动法的四项法规，反对私有化、临时合同制度、人工智能、工人的工作负担（工作时间增加、实际工资下降、糟糕的工作条件和福利项目削减），并要求最低工资和就业保障。在农民组织的广泛支持下，工会于 3 月 28 日至 29 日举行的全国性罢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表明了工农的团结。

##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帝国主义正在剥削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以克服其危机。它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并正在削减永久性工作和福利项目。它正在使人民承担极为沉重的税负。新冠疫情中采取的限制疫情的措施、工作岗位的取消、工作时间的增加、工资的减少和高昂的物价都导致无产阶级、雇员、学生和环境活动家进行大规模的鼓动和罢工。在一些国家，工人的示威活动正在采取战斗的形式。

为了维持美国不断衰退的世界霸权，美国新任总统乔·拜登正在采取和实施最具侵略性的决定。它维持了北约和七国集团的霸权，以控制作为帝国主义竞争者出现的俄罗斯和中国；它加强了“四方安全对话”；组成了“澳英美联盟”。但欧洲没有条件与美国合作。德国和法国依赖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另一方面它干预台

湾事务，中国和美国在台海水域的军事演习竞争变得越来越危险。俄罗斯和中国达成了军事合作的协议。冷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沉迷于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而美国则违背了对俄罗斯的承诺，扩大了北约，并通过武力或引诱使 30 个国家加入北约；美国宣布它将使身为欧洲第三大军事力量的乌克兰加入；与乌克兰进行联合军事演习；部署其军事力量、军舰和导弹以支持乌克兰；俄罗斯因此在乌克兰边境部署了 15 万军队，帝国主义矛盾爆发，导致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在过去的两个月里，这种情况正在以破坏性的方式进行着。4 月 12 日的俄乌间谈判失败了。这场战争无疑将导致进一步的破坏。它将把人民推入难以忍受的压迫和危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和霸权利益的游戏中备受煎熬。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逼近。

这场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形式爆发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乌克兰是美国手中的一个诱饵。我们党呼吁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谴责这场战争。它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坚持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观点：“工人没有祖国...总之，共产主义者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各国工人团结起来”，以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列宁的教导，“……觉悟的无产阶级不支持任何帝国主义阵营……”，不站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一边。全世界的人民都在进行战斗的斗争，要求退出美国领导的北约，回击美国为维持其不断衰落的世界霸权而采取的使乌克兰成为替罪羊的破坏性措施，俄罗斯必须按照世界人民的愿望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要召回其军队。革命的条件正在发展。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利用这些条件，加强反帝斗争。因此，它必须向普京政府施压。如果俄罗斯沉迷于核战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它必须从 1917 年列宁和斯大林同志领导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变为内战使整个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十月革命成功的伟大经验中学习，并坚持其遗产，必须推翻普京政府。它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新的、更高的社会主义政府。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被压迫人民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战斗的运动，要求停止在这场战争中唆使乌克兰。如果美国-北约联盟沉迷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必须把它转变为内战。

同样，新兴的社会帝国主义势力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必须给它上一课。我们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保护逃往其他地区的乌克兰人民。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必须谴责泽连斯基政府亲北约，特别是美国-欧盟帝国主义，把国家变成北约，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卫星国的政策。他们必须将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争转化为内战，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生存。乌克兰的被压迫人民必须在国内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与各种帝国主义斗争，实现主权。顿巴斯地区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共和国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俄罗斯帝国主义来实现自己的未来。落后国家的人民必须为废除各种条约而斗争，这些协议包括买办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达成的军事条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马列毛主义力量从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中获得解放并建立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和直接任务，就是将帝国主义从这个地球上铲除，建立没有战争的社会主义。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有必要根据目前的具体条件建立一个适当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近来，世界上的先锋团体和组织正在接受当前劳苦大众的要求，并逐步巩固，以便为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提供统一的领导，使其朝着解放的方向发展。这些人之间的统一和团结正在发展。令人欣慰的是，一些毛派组织同意建立国际论坛的必要性，并要求立即采取这方面的措施。这表明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观力量正在发展。在此基础上，让我们努力建立具有具体计划的国际联合论坛，以提供统一的领导，打击帝国主义的各种进攻和战争，建立世界和平（特别是在乌克兰），以及进行反帝斗争。

让我们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让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团结起来！

# 关于帝国主义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印共（毛）中央委员会 国际事务局 发言人 阿穆卢特

2022 年 4 月 6 日

俄罗斯帝国主义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已经 42 天了。以俄罗斯武力侵略乌克兰形式爆发的战争，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地缘、经济和军事霸权的激烈程度的结果，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帝国主义的冷战。美国以乌克兰为诱饵，以维持其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它选择乌克兰作为对抗俄罗斯的战线。俄罗斯正试图在乌克兰的舞台上反击美国-北约联盟。在这场战争中，美国试图复兴和扩张其单极世界，而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俄罗斯则试图维持其主导地位，并阻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扩张。...俄罗斯正在采取策略以达到尽快结束战争的目的，而美国正在采取策略，通过尽可能拖延战争来加重俄罗斯的战争负担。自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宣布作战以来，美国-北约联盟对俄罗斯实施了严酷的阶段性经济、外交和文化制裁，旨在将其与世界隔离，为其自身利益服务，并在必要时甚至不惜诉诸于核战争。为了自己的利益，俄罗斯也同样为此做好了准备。由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再次逼近。

直到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数千名士兵和数千名无辜民众在这场战争中丧生。战争一天比一天激烈。乌克兰正遭受严重破坏。情况很悲惨。340 万人作为难民离开该国。650 万人无家可归。这些城镇的城镇、学校和医院都关闭了。无数家庭因缺乏食物、饮用水和药品而受苦。战争正在加剧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由于俄罗斯的原油和天然气以及乌克兰的小麦停止出口，价格急剧上涨。例如，在斯里兰卡，一升牛奶的价格上升到 1980 卢比，一公斤糖为 290 卢比，一公斤大米到 500 卢比。人们反抗这种情况，拉贾帕克萨政府实施了紧急状态。物价上涨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实际工资正在下降。失业形势严峻。民众购买力严重下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存在大规模饥饿死亡的危险。战争给帝国主义者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而人民却一无所获，只有毁灭、经济灾难和死亡。众所周知，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无视人民，破坏经济，挑起永无休止的战争。

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战争。它号召工人、农民、中等阶级、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起来谴责战争。它号召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坚持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克·恩格斯的观点：“工人没有祖国...总之，共义者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各国工人团结起来”，以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列宁的教导，“……觉悟的无产阶级不支持任何帝国主义阵营……”，不站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一边。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某个阶级在战前长期推行的政治，这个阶级在战时必然地和不可避免会继续加以推行，只是变换了行动方式而已。”同样，政治也不能与经济因素分开。在乌克兰和东欧，帝国主义对超额利润的激烈争夺以战争的形式出现。

无论帝国主义是强还是弱，无论是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哪一个国家，工人阶级都不必为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流血。没有好帝国主义和坏帝国主义之分。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选择一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独立路线。他们必须脱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为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而斗争。在帝国主义时代，正义战争只意味着工人阶级及其盟友为夺取政权而发动的革命战争。“只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使人类摆脱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危机。无论革命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或者如果反革命的浪潮获得暂时的胜利，工人阶级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摘自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1919 年 3 月 22 日）。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抗议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破坏性战争以及帝国主义通过出售包括可以毁灭全世界的核武器（译者注：此处尚有疑问）在内的几种致命武器并部署军事力量而导致世界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谋。我们党支持这些斗争。它号召整个党的队伍、人民解放游击军部队、革命人民组织、整个印度被压迫阶级、部分和民族成为这些运动的一部分。它号召工人阶级、农民等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民主人士团结起来推进这些运动，以期从地球上铲除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俄罗斯的被压迫的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中加强抗议斗争，按照世界人民的意愿，要求立

即无条件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并向普京政府施压。俄罗斯军队必须将武器瞄准自己的政府。如果普京政府鼓吹核战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必须吸取 1917 年列宁、斯大林同志领导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整个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十月革命成功的伟大经验。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变为内战，并且必须推翻维护其遗产的普京政府。他们必须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政府。

美国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必须起来战斗，要求停止在美国领导下北约军事同盟的扩大、要求美国停止向其卫星国和傀儡/买办政府出售武器、以及在那些国家部署帝国主义军队，要求销毁所有破坏世界的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并解散北约军事联盟。美国如果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必须将其转化为国内战争。

被压迫人民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坚决起来战斗，反对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帝国主义政府所奉行支持战争的政策（提供武器、部署军队、经济援助、政治辩护等诸如此类），反对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政府在乌克兰战争选边站（俄罗斯或乌克兰），并煽动工人和被压迫人民互相残杀的做法。帝国主义者如果敢于参加世界大战，就必须埋葬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府。

我们党向在乌克兰整个地区遭受轰炸的工人和人民表示声援。它谴责杀害平民的行为。我们党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保护出于具有人道主义目的难民逃往其他地区的乌克兰人民。乌克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必须谴责将乌克兰变成北约，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卫星国的泽连斯基总统的亲北约、亲美帝国主义政策。必须将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争转变为内战，夺取国家政权以维持民族的生存。全国被压迫人民必须在乌克兰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反对各种帝国主义，保护乌克兰的主权。我们党呼吁乌克兰顿巴斯地区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被压迫民族，你们的未来，不应该依赖于俄罗斯帝国主义，而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

印度的工人、农民、被压迫人民、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必须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冷战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发出立即停止战争的声音。他们必须支持乌克兰人民为国家主权而战。战争对印度的影响将非常强烈。我们必须动员各阶层各部分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印度买办统治阶级的破坏性政策。我们必须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协调开展人民斗争和人民战争，以反对这场战争。我们必须发起反对印度教法西斯莫迪政府的激进运动，要求印度必须退出美帝国主义领导的“四边安全对话”军事同盟，不加入帝国主义同盟。如果战争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印度加入任何一方，印度被压迫人民、被压迫阶层和被压迫民族必须予以谴责。我们必须揭露印度教法西斯阴谋以虚假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名，煽动民族沙文主义和战争狂潮，使印度军队和印度人民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我们必须把战争变成内战。我们必须加强人民战争，建立解放区，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

落后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反对买办政府甘心受奴役于帝国主义主人的战争政策。如果世界大战开始，它必须转变为内战。只有走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解放区才能建立起来。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本质上对世界人类和自然而言具有破坏性、无政府状态和随意性的特点。它是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环境、难民和其他类型危机的中心。它使工人、农民和中等阶级陷入失业、步入险区。它是无助的，习惯于不可恢复的化石燃料（《白皮肤，黑色燃料：关于化石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译者注：这是一本揭露批判极右翼环境问题立场的著作）。对于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而言，不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就不能获得解放。发动工人、农民、中等阶级等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铲除帝国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

在乌克兰爆发的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战争，同也门的战争，对巴勒斯坦的战争，对索马里的战争一样，也是对妇女的战争，对无家可归者的战争，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各种有色人种的战争，对工人的战争，对民主的战争，对环境的战争——这些都已经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国际工人阶级有责任将这些战争转变为各自地方的内战。俄国工人阶级和各种被压迫人民战胜帝国主义俄国，美国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战胜美帝国主义，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打倒破坏自然环境的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并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党号召全世界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毁灭世界的基础，并促使世界上的工人、农民、中等阶级和其他被压迫人民为这一斗争团结起来，在各自国家进行人民运动和人民战争配合反帝运动。我们党认为，只有从这个世界上铲除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实现全面发展。

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是帝国主义争夺的表现！

谴责乌克兰的帝国主义冷战！

停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乌克兰人民将实现他们国家的主权！

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动员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以反对帝国主义！

动员世界人民进行战斗，对抗核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在世界上铲除帝国主义！

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替代选择！

将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内战！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战争转变为内战，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

## ◎原著选读

# 列宁：怎么办？（节选）

##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拿 1894-1901 年间的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活动片断来作例子。我们已经讲过，当时的青年学生普遍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自然，他们这样倾心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理论，甚至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理论，不如说是把它当作对于“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当作向敌人进攻的号召。于是，这些新战士就在装备和训练极差的情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练。他们像种地的庄稼汉那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这个小组逐步地开展了愈来愈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博得了有教养社会的一部分人的同情，他们捐出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交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那些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话和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的人，那些同工人建立并保持联系和印发过传单的人，现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向公开的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张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游行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結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是因为警察局自然差不多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初露头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对它最合适的时机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以便获得明显的犯罪构成，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留下来“繁殖”（据我所知，我们的人和宪兵都使用这个术语）。我们不能不把这种战争比作一群农民操起木棒去进攻现代的军队。而令人惊奇的是，运动富有生命力，尽管作战的人这样毫无训练，但运动还是扩大起来，发展起来，并且往往获得胜利。固然，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装备的简陋在开始的时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广泛地吸收战士的条件之一。但是，重大的军事行动一旦开始（这种行动实际上从 1896 年夏季罢工时起就开始了），我们军事组织方面的缺点就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政府虽然在一开始表现过慌张，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向社会诉说社会党人如何行凶作恶，或者把工人从两个首都流放到外省工业中心去），但它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斗争条件，把自己那些装备精良的奸细、暗探和宪兵队伍布置到适当的地方去。于是大暴行连连发生，牵连的人数众多，地方小组往往被一网打尽，使工人群众简直失去了所有的领导者，使运动带有非常的突变的性质，使工作上的任何继承性和连贯性都无法建立起来。地方活动家们异常分散，小组的成员变换无常，人们在理论、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缺乏修养和眼界狭小，这些都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在有些地方，由于我们缺

乏镇静态度和不能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而躲开他们：工人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常常遭到破坏！

至于一切有头脑的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开始感到了这种手工业方式是一种病症，——这是每一个稍微了解一点运动情况的人都知道的。为了使不了解运动情况的读者不致以为运动的特殊阶段或特殊病症是我们故意“虚构”出来的，我们打算引证一下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位见证人所说的话。不过请不要因引文太长而埋怨我们。

波一夫在《工人事业》第6期上写道：“如果说，逐渐向更广泛的实际行动的过渡，即直接由俄国工人运动现在所处的总的过渡时期所决定的过渡是一个特点……那么在俄国工人革命这一总的机器中还有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特点。我们所说的就是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普遍缺少能够进行活动的革命力量。由于工人运动普遍活跃，由于工人群众普遍进步，由于罢工事件日益频繁，由于工人的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群众性的形式而使政府加紧采取迫害、逮捕、流放和驱逐的手段，于是这种缺少优秀的革命力量的情形就愈来愈明显，而且无疑也不能不影响到运动的深度和一般性质。许多罢工都没有受到革命组织有力而直接的影响……鼓动传单和秘密书刊都感不足……工人小组没有鼓动员……与此同时，经费也常感短缺。总而言之，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现有的革命家人数太少，不能对所有骚动的工人群众都施加影响，不能使所有的骚动多少带一点严密性和组织性……单个的小组、单个的革命家没有集合起来，没有统一起来，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纪律的、各部分都有计划地发展的组织……”接着作者说明，旧的小组一遭到破坏马上有新的小组产生出来的事实“只是证明运动富有生命力……而并不是说明已经有足够的完全合格的革命活动家”，然后作者得出结论说：“彼得堡的革命家缺乏实际修养，也反映在他们的工作结果方面。最近的审判案，特别是‘自我解放社’和‘劳工反资本斗争社’审判案清楚地表明：青年鼓动员不大熟悉本工厂的劳动条件以及进行鼓动的条件，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则，而只是领会了〈领会了吗？〉社会民主党的一般观点，所以只能做四五个月或者五六个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捕，而他的被捕往往使整个组织或至少是一部分组织遭到破坏。既然一个团体只能存在几个月，试问它的活动能有成就和效果吗？显然，现有各组织的缺点不能完全归咎于过渡时期……显然，现有组织的成员的数量，主要是质量在这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严格挑选成员的条件下把各个组织切实地统一起来。”

## （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现在，我们应当来谈谈每个读者大概都自然会产生的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说，作为整个运动所固有的成长中的病症的这个手工业方式，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派别之一的“经济主义”是有联系的呢？我们认为可以这样说的。缺乏实际修养，不善于做组织工作，这确实是我们大家的通病，甚至从一开始就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也不例外。当然，谁也不能因为实际工作者缺乏修养这一点而责备他们。但是，“手工业方式”这个概念，除了表示缺乏修养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即整个革命工作规模狭小，不懂得在这种狭小的工作基础上是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企图为这种狭隘性辩护，把它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也崇拜自发性。这种企图一露头，无疑就说明手工业方式是同“经济主义”有联系的，就说明我们如果不摆脱一般“经济主义”观点（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务的狭隘见解），就不能摆脱我们组织工作的狭隘性。这种企图表现在两方面。有些人说，工人群众自己还没有提出革命家“强加于”他们的那些广泛的战斗的政治任务，工人群众还是应当为当前的政治要求而斗争，“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而同群众运动“能够胜任的”这种斗争相适应的，当然就是连最缺乏修养的青年也“能够胜任的”组织）。另一些人则根本不赞成什么“渐进主义”，他们说，可以并且应当“实现政治革命”，但为此完全不必建立什么用坚定而顽强的斗争来教育无产阶级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只要我们大家操起我们“能够胜任的”和已经用惯的木棒来干就行了。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只要我们举行总罢工，或者只要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来刺激一下“萎靡不振的”工人运动就行了。这两派人，即机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都屈服于盛行的手工业方式，不相信有摆脱它的可能，不了解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

我们刚才摘引了波一夫的话：“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这种“实地观察者的有价值

的报道”（《工人事业》编辑部对波一夫那篇文章的评语），对于我们有双重的价值。它表明，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目前危机的基本原因是领导者（“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民主党人）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它表明，“经济派”来信（《火星报》第12号）的作者们以及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所谓轻视自发因素和平凡的日常斗争的意义的危险，所谓策略-过程等等的各种论调，正好就是对手工业方式的歌颂和维护。这些人一提到“理论家”这个词就做出一副极端鄙视的怪样子，而把自己对缺乏实际经验和不开展状态的崇拜称为“对实际生活的敏感”，其实他们不过是暴露自己不了解我们最迫切的实际任务而已。他们向那些落伍的人喊道：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他们向那些在组织工作中缺乏毅力和首创精神，缺乏广泛而大胆地开展工作的“计划”的人高喊“策略-过程”！我们的主要过失就是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去适应当前“显著的”“具体的”日常经济斗争的利益，而人们却继续向我们高唱什么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再说一遍：这种“对实际生活的敏感”，真同民间故事里的那个人物的“敏感”一样，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

请你们回忆一下这些才子用无与伦比的、真正是“纳尔苏修斯式的”高傲态度来教训普列汉诺夫时所说的一段话吧：“切实的、实际的政治任务，即争取实现政治要求的适当而有成效的实际斗争，根本是〈原文如此！〉工人小组所不能胜任的。”（《〈工人事业〉编辑部的回答》第24页）但是，先生们，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在手工业者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还没有摆脱这种方式以前，这些“手工业者”小组对于政治任务自然是不能胜任的。如果这些手工业者甚至还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如果他们一写到“实际”一词的时候就一定要加上着重标记，以为求实精神要求他们把自己的任务降低到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所了解的水平，那么这些手工业者当然是不可救药的，他们的确是根本不能胜任政治任务的。但像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普列汉诺夫做得万分正确，他不仅指出了这个革命阶级，不仅证明了它的自发觉醒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并且向“工人小组”提出了崇高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你们却想借口从那时起发生的群众运动来降低这个任务，来缩小“工人小组”的毅力和活动范围。这不是手工业者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又是什么呢？你们爱以求实精神自夸，却没有看见俄国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的事实，即在革命事业中不仅小组的毅力，甚至个人的毅力也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奇迹。也许你们以为在我们的运动中不会有70年代那样的卓越的活动家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缺乏修养吗？但我们正在提高修养，还要继续提高修养，而且一定会具备很好的修养的！固然，不幸的是在“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死水上面泛起了一层泡沫，出现了一些对自发性顶礼膜拜、肃然起敬地注视着（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俄国无产阶级的“后背”的人。但我们一定能除去这层泡沫。正是现在，遵循真正革命的理论的俄国革命家，他们依靠真正革命的和自发觉醒起来的阶级，终于（终于！）能够直起腰来，尽量施展自己全部的勇士般的力量。为此，只需要使一切想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缩小我们的组织工作规模的企图，在人数众多的实际工作者中间，在人数更多的、还在学生时代就梦想做实际工作的人中间，都受到嘲笑和鄙视。先生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驳斥《工人事业》的话：“在24小时内可以改变某个专门问题上的鼓动策略，可以改变党组织某一局部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变自己对于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需要战斗组织和群众中的政治鼓动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不要说在24小时内，即使在24个月内加以改变，也只有那些毫无原则的人才办得到。”《工人事业》回答道：“《火星报》所提出的这个唯一仿佛是属实的罪状是毫无根据的。《工人事业》的读者清楚地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在《火星报》出版以前，就不仅号召进行政治鼓动”……（同时又认为不仅工人小组不能，“而且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也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而只能把争取当前政治要求的斗争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认为“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当前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并且还从国外运来了自己的出版物，供当时在俄国活动的同志们作唯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材料之用”……（顺便指出，你们在这唯一的材料中，不仅最普遍地运用了仅仅在经济斗争基础上进行的政治鼓动，并且竟把这种被缩小了的鼓动看作是“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先生们，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你们这种论据恰巧证明，在只有这种唯一的材料的情况下，就需要有《火星报》出版并且需要有《火星报》来同《工人事业》进行斗争吗？）……“另一方面，我们的出版工作在事实上准备了党在策略方面的一致”……（是说一致认定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吗？多么宝贵的一致啊！）……“因而也就准备了建立‘战斗组织’的可能；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联合会做了国外组织一般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人事业》第10期第15页）这种逃避问题的说法是徒劳无益的！你们确实做过你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根本

也没有想要否认这一点。可是我曾断言并且现在还要断言，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由于你们目光短浅而被缩小了。至于谈论什么建立“战斗组织”来为“当前的政治要求”而斗争或者来“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那就是可笑的了。

但是，假使读者要想看到“经济派”如何迷恋于手工业方式的绝妙例子，那自然应当撇开折中主义的不稳定的《工人事业》，而去看看彻底的坚决的《工人思想报》。尔·姆·在《增刊》第13页上写道：“关于所谓革命知识分子问题，我们现在要讲几句话。固然，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屡次实际表明自己有‘同沙皇制度进行决战’的充分决心。不幸的是，我们遭受政治警察残酷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把反对这种政治警察的斗争当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至今还弄不清楚‘从什么地方获得力量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这样一个问题。”

自发运动的崇拜者（贬义的崇拜者）的这种极为轻视同警察作斗争的态度不是妙极了吗？他甘愿为我们不善于做秘密工作辩护，硬说在自发的群众运动的条件下，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赞成这种奇怪结论的人，一定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大家都已痛切地感觉到我们革命组织的缺点了。但是，如果有人，例如马尔丁诺夫，对这种结论也不表赞同，那只是因为他不善于或没有勇气来彻底地考虑自己的论点而已。的确，为了执行由群众提出的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这样一个“任务”，难道需要特别关心建立什么牢固的、集中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吗？难道那些丝毫不“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群众不是也在执行这样的“任务”吗？况且，如果除了少数领导者之外，没有那些丝毫不能“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工人（绝大多数的工人）参加，这样的任务难道是能够实现的吗？这样的工人，这些普通的群众，在罢工中，在街头上同军警的斗争中能够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能够（并且也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我们整个运动的结局，可是，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革命家。所以我们不仅要设法使群众“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要设法使工人群众愈来愈多地“提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同纯粹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在书刊上反映很少，但在我们“政治家”同那些或多或少地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同志们谈话和争论时却谈得很多。这个问题值得专门谈一下。不过，我们首先还要引一段话来结束我们关于手工业方式同“经济主义”有联系这个见解的说明。

N.N.先生在自己的《答复》中写道：“‘劳动解放社’要求同政府进行直接的斗争，却没有考虑一下这种斗争所需要的物质力量何在，没有指出斗争的道路何在。”这最后几个字作者加上了着重标记，并且对“道路”一词加了这样的注释：“这种情况决不能用保守秘密来解释，因为纲领中说的不是密谋而是群众运动。而群众是不能走秘密道路的。难道能有秘密的罢工吗？难道能有秘密的示威和请愿吗？”（《指南》第59页）作者把斗争的“物质力量”（举行罢工和示威的人）和斗争的“道路”都讲到了，但他还是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崇拜”群众运动，即认为群众运动是使我们不必表现革命积极性的东西，而不是应当鼓励和促进我们的革命积极性的东西。罢工对于那些参加罢工以及同罢工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可能是秘密的。但罢工对于俄国工人群众，却可能还是（而且多半还是）“秘密的”，因为政府总是设法切断外界同罢工者的任何联系，总是设法使一切罢工消息都传不出去。于是就需要专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永远不能由参加罢工的那样广大的群众来积极进行的。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完全按照艺术的规律”来组织。组织这种斗争的工作并不因为群众自发卷入运动而变得不太需要。恰巧相反，正因为如此它就变得更加需要，因为我们社会党人如果不能防止警察把一切罢工和一切示威变成秘密的（而有时我们自己也没有秘密地准备），那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对群众所负的直接责任。我们所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也会从自己的队伍中选拔出愈来愈多的“职业革命家”（只要我们不想方设法使工人始终在原地踏步不前）。

### （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假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把政治斗争的概念和“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概念等同起来，那他自然也就会把“革命家的组织”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和“工人的组织”这个概念等同起来。事实上也真是这样，所以在我们谈论组织时，简直就是各讲各的话。例如，我现在还记得我同从前不认识的一位颇为彻底的“经济派”谈话的情形。当时我们是在谈《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这本小册子，我们两人很快地就一致认为这本小册子的基本缺点是忽视了组织问题。我们满以为我们彼此是意见相同的，但是……当继续谈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两个人说的不是一回事。我的对话人责备该书作者忽视了罢工储金会和互助会等等，而我指的却是为“实现”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家组织。在这种意见分歧一暴露之后，往下我就不记得我和这个“经济派”在任何原则问题上有什么共同的意见了！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经济派”在组织任务方面也像在政治任务方面一样，总是从

社会民主主义滑到工联主义上去。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而且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一定要同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一样。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自然，我在这里以及下文中都只是指专制的俄国而言）。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三种区别吧。

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职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区别也像工联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区别一样，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后者同前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里不免要因历史、法律以及其他种种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复杂程度等等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在我们看来，这种关系应当尽量密切些，尽量简单些），但在自由国家里，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组织是根本不会混同的。在俄国，乍看起来，专制制度的压迫似乎是把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消除了，因为任何工会和任何小组都被禁止，因为罢工这一工人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和主要手段，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罪（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政治罪！）。因此，我国的条件一方面很能使那些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人“碰到”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民主党人“碰到”会把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为一谈的问题（我们的克里切夫斯基之流、马马丁诺夫之流及其同伙拼命谈论第一种“碰到”，而没有看到第二种“碰到”）。的确，请你们想象一下那些 99% 埋头于“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人吧。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在他们活动的整个时期（4-6 个月），一次也不会碰到必须建立更复杂的革命家组织的问题；另一部分人大概会“碰到”较为流行的伯恩斯坦主义书刊，从中得到“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极其重要的信念；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也许会沉醉于一种迷人的思想，即要向世人作出一个“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新榜样，一个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相联系的新榜样。这种人也许认为：一个国家走上资本主义舞台，从而走上工人运动舞台的时间愈晚，社会党人也就愈能参加并帮助工会运动，非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也就可能而且应当愈少。如果到此为止，那么这个推论是完全正确的，可惜这种人还走得更远，妄想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工联主义完全融合起来。我们拿《圣彼得堡斗争协会章程》为例就可以马上看出，这种妄想对于我们的组织计划产生了多么有害的影响。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这是对的。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但是，参加组织的成员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所需要的训练，要比参加经济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怎样才能解决既要成员广泛又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呢？怎样才能使行业组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在某些国家里，先有行业工会的合法化，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或者是使组织仍旧处于秘密状态，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是松散的，使秘密性对于广大会员几乎等于零。

在俄国，非社会主义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的合法化已经开始了，并且毫无疑问，我们迅速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每一步进展，都将加强和鼓励这种合法化的企图，——这种企图主要来自拥护现存制度的人，但一部分也来自工人本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合法化的旗帜已经由瓦西里耶夫之流和祖巴托夫之流打出来了，奥泽罗夫之流和沃尔姆斯之流的先生们也已经答应支持合法化，而且已经给以支持；在工人中间已经有了新潮流的信徒。我们今后也不能不考虑这个潮流。怎样考虑呢？对于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未必会有两种意见。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把祖巴托夫之流和瓦西里耶夫之流、宪兵和神父参加这个潮流的一切事实揭露出来，把这些参加者的真正意图讲给工人听。同时我们还应当揭穿自由派活动家在公开的工人集会上演说时会流露出来的一切调和的、“和谐的”论调，不管他们提倡这些论调是由于真心认为阶级和平合作要好些，还是由于想巴结上司，或者只是由于笨拙无能。最后，我们还应当提醒工人，使他们不要落入警察经常设置的圈套中去，因为警察常在这种公开集会上和允许存在的团体内侦查“过激分子”，并企图通过合法组织把奸细也派到不合法的组织里来。

但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忘记工人运动合法化归根到底只会使我们获得好处，而决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好处。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运动来分清莠草和小麦。关于莠草，我们已经说过了。而所谓小麦，就

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使我们革命家摆脱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些工作的发展必然会供给我们愈来愈多的鼓动材料。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对祖巴托夫之流和奥泽罗夫之流说：先生们！努力干吧，努力干吧！既然你们想设置圈套来陷害工人（无论是用直接挑衅的手段也好，还是用“司徒卢威主义”来“诚实地”腐蚀工人也好），那我们就要设法揭穿你们。既然你们真正前进了一步（虽然表现的形式是极其“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但终究是前进了一步），那我们就要说：请吧！只有真正扩大，哪怕只是稍微扩大工人的活动范围，那才是真正前进了一步。凡是这样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我们，并且会加速合法团体的出现，在这些团体里，不会是奸细抓住社会党人，而是社会党人抓住自己的信仰者。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清除莠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温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麦。我们把莠草拔掉，从而清出土地使麦种发育成长。而在阿法纳西·伊万内奇之流和普尔赫丽娅·伊万诺夫娜之流从事温室栽培的时候，我们则应当训练出一些既会锄今天的莠草，又会割明天的小麦的人。

总之，我们不能用合法化来解决建立尽量少带秘密性和尽量广泛的工会组织的问题（但是，假如祖巴托夫之流和奥泽罗夫之流给我们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哪怕是部分的可能性，那我们也会很高兴，为此我们要尽量坚决地同他们斗争！）。因此只有建立秘密的工会组织这条道路可走，而我们应当对于已经走上（这是我们确实知道的）这条道路的工人给以各方面的帮助。工会组织不仅能大大促进经济斗争的发展和加强，并且能大大帮助政治鼓动和革命组织工作。为了得到这种结果，为了把正在开始的工会运动引上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轨道，首先必须弄清楚彼得堡的“经济派”几乎已经鼓吹了五年之久的那个组织计划的荒谬性。这个计划既在 1897 年 7 月的《工人储金会章程》上（《〈工作者〉小报》第 9-10 期合刊第 46 页——转载自《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作了说明，又在 1900 年 10 月的《工人联合会章程》上（曾在圣彼得堡印成传单，《火星报》创刊号上也曾经谈到它）作了说明。这两个章程的主要缺点，就是对广泛的工人组织作了细节方面的规定并且把这种组织同革命家组织混为一谈。我们可以拿比较详尽的第二个章程来看。这个章程共 52 条，其中有 23 条是说明组织结构、办事细则以及“工人小组”的权限的，这些小组设在每个工厂内（“每组不超过 10 人”）并由它们来选举“（工厂）中心小组”。第 2 条上说：“中心小组应注意本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编写本厂大事记。”“中心小组每月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出纳情况”（第 17 条），等等。有 10 条专讲“区组织”，有 19 条专讲“工人组织委员会”和“圣彼得堡斗争协会委员会”（由各区以及各“执行组”即“宣传组、外省联络组、国外联络组、贮藏组、出版组和储金组”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社会民主党等于负责工人经济斗争的“执行组”！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经济派”的思想已经完全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而滑到工联主义上去，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嘴上说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是同“沙皇政府的专横暴虐”作斗争，而写出来的却是这样的组织章程，这就说明他们丝毫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政治任务。在 50 多条章程中间，没有一条证明他们稍微懂得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来揭露俄国专制制度所有各个方面和俄国各个社会阶级的整个面貌。按照这样的章程，不仅政治的目的，甚至工联的目的也无法实现，因为工联的目的要求按职业组织起来，而在章程里连这一点也根本没有提到。

大概最令人注目的是这整个“体系”的惊人的烦琐，企图在三级选举制下，用千篇一律和琐碎得可笑的条例构成的固定线索，把每个工厂同“委员会”联系起来。在这里，备受“经济主义”狭小眼限制的思想，又沉溺到充满公事程序和文牍主义的烦琐条文中了。其实，这些条文四分之三当然是永远也不会实行的，而在每个工厂中都设有中心小组的这种“秘密”组织倒使宪兵易于进行广泛破坏。波兰的同志已经经历过大家都热中于普遍设立工人储金会这样一个运动的阶段，但是当 they 弄清楚这只能使宪兵获得丰收时，他们就马上放弃了这种思想。假使我们想有广泛的工人组织，同时又不愿意遭到广泛破坏，不愿意使宪兵满意，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使这些组织完全不具有什么固定的形式。这样，它们能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能呢？那就看看这些职能吧：“……注意工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编写工厂大事记。”（章程第 2 条）难道这一定要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吗？难道不组织任何专门的团体而用在秘密报纸上登载通讯的方法就不能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吗？“……领导工人为改善他们在工厂内的状况而斗争。”（章程第 3 条）这也用不着什么固定的组织形式。工人想提出什么要求，每一个头脑稍微清楚的鼓动员都可以从闲谈中确切地打听出来，而打听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些要求告诉那个狭小的而不是广泛的革命家组织，以便印发相应的传单。“……组织储金会……每一卢布工资交纳两戈比会费”（第 9 条），——并且每月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出纳情况（第 17 条），把不交会费的会员除名（第 10 条），等等。在警察看来，这真是再好没有了，因为这样一来，要摸透“工厂中心储金会”的一切秘密，要没收它们的金钱，要逮捕一切优秀分子就容易极了。

发行价值一戈比或两戈比的印花，盖上某个（很狭小的很秘密的）组织的图章；或者根本不用印花而实行募捐，在秘密报纸上用某种暗语把捐款帐目公布出来，这岂不是更简便吗？目的同样可以达到，而宪兵要找到线索就困难百倍了。

我本来还可以拿章程作为例子继续进行分析，但是我认为讲得已经够了。一个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固定的形式也能充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并且执行得正像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不顾一切宪兵的破坏而得到巩固和发展。

有人会反驳我说：一个组织这样松散，根本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甚至连固定的、经过登记的成员都没有，根本就不配称为组织。也许是这样。我不追求名称。但这种“没有成员的组织”能够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并且一开始就能够保证我们未来的工联同社会主义发生牢固的联系。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从建立那种好像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两种目的都实现不了，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泽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

这种革命家组织的职能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来详细谈谈。但是，我们首先还要分析一下我们的恐怖派的一段极其典型的议论，他在这里又成了（真是时运不佳！）“经济派”的近邻。在供工人阅读的《自由》（第1期）上，载有一篇题为《组织》的文章，该文的作者想为他那些老相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经济派”辩护。

他写道：“群众一声不响，没有觉悟，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这是很糟糕的。你们看，学生们离开大学城，各自回家过节或过夏天，于是工人运动也就停顿下来。难道这种从旁推动的工人运动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吗？哪里能够呢……它还没有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专靠人家扶着走。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学生各自回家，运动就停止；牛奶一失去精华，立刻就变酸；‘委员会’被破坏，当新的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又是一片沉寂；至于将要建立起什么样的委员会，还不得而知，——也许同先前的完全不一样：先前的委员会说一套，新成立的委员会又会另说一套。过去和将来之间失掉联系，过去的经验不能为将来所借鉴。这都是由于在深处，在群众中间没有根子；做工作的不是百来个蠢人，而是十来个聪明人。十来个人常常可以一网打尽，但是只要一个组织能够包括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由群众来干，那无论谁怎样想方设法也不能伤害我们的事业了。”（第63页）

事实描写得倒是正确的。我们的手工业方式的情景描绘得倒还不错。但结论却和《工人思想报》一样糊涂，在政治上一样不妥当。这个结论非常糊涂，因为作者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怎样更好地同宪兵进行斗争的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这个结论在政治上非常不妥当，因为作者并不是拒绝坏的领导者而去寻找好的领导者，而是想根本拒绝任何领导者而去寻找“群众”。这是一种想把我们在组织方面拉向后退的企图，正像那种主张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代替政治鼓动工作的思想在政治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一样。现在我真是感到有点应接不暇，真不知从何着手来分析《自由》奉送给我们的这样一大堆糊涂观念。为了清楚起见，我就先举例来说吧。就拿德国人作例子。他们的组织包括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一点吧？可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又是多么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多么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啊！在国会中曾经不止一次听见敌对党的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样的民主派！你们只是口头上讲工人阶级的运动罢了，实际上出面的总是这帮首领。一年复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所谓从工人中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册封的官吏还难得调换呢！”这是企图把“群众”与“首领”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坏群众对“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坚定性和稳定性，但是德国人对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只是嗤之以鼻。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

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德国人自己的队伍中,也有过一些蛊惑家,他们竭力奉承“几百个蠢人”,把他们抬高到“几十个聪明人”之上,一味赞美群众的“筋肉条条的拳头”,激发他们(像莫斯特和哈赛尔曼那样)去从事轻率的“革命”行动,散布对坚定刚毅的领袖的不信任。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只是由于它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形形色色的蛊惑家不断地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才得到这样的发展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党整个危机产生的原因是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还没有获得有充分修养的、开展的、有经验的领导者,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才子们却像伊万努什卡那样带着深思的神情说:“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的,这是很糟糕的!”

“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不中用,因为它不稳定”,——完全正确。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至于能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是学生还是工人,这都一样。而你们作出的结论,却是说不应当从旁推动工人运动!你们由于政治上幼稚,竟不知道你们的这种主张只是有利于我们的“经济派”和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请问,我们的学生“推动”我们的工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唯一的表现就是,学生把他们所具有的一些零星的政治知识和他们所获得的片断的社会主义观念(因为目前学生的主要精神食粮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而合法马克思主义只能提供一些起码知识和片断)传授给工人。在我们的运动中,这样的“从旁推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少得出奇,少得可怜,因为我们已经过分地热衷于闭关自守,过分奴隶般地崇拜那种初步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的经济斗争”了。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这样的“推动”。但正因为你们选用了“从旁推动”这样可恶的字眼,就必然会使工人(至少是那些像你们一样不开展的工人)不信任一切从旁给他们提供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使他们对所有这些人都本能地表示抗拒,——这样,你们就成了蛊惑家,而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

是的,是的!你们不要马上叫喊起来,说我进行论战时采取了“非同志的方法”吧!我根本不想怀疑你们心地纯洁。我已经说过,一个人只因为政治上幼稚,也可以成为蛊惑家。但是我也指出,你们已经堕落到了蛊惑人心的地步。而且我始终都要不停地重复说,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他们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因为不开展的工人不能识破这些以工人朋友的资格讲话,有时甚至是真心以工人朋友的资格讲话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在混乱和动摇的时期,在我们运动刚刚形成的时期,最容易的莫过于蛊惑人心地诱惑群众,而群众只有在经过最痛苦的教训之后才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所以,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口号应当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的《自由》,又反对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的《工人事业》(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地谈到)。

“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蠢人容易些。”这个了不起的真理(对于你们提出这个真理,百来个蠢人总是会拍手叫好的),看来好像是不辩自明的,这只是因为你们在议论时从一个问题跳到了另一个问题上去。你们开始谈论并且继续还在谈论捕捉“委员会”,捕捉“组织”的问题,而现在你们却跳到捕捉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个问题上去了。当然,我们的运动所以无法捕捉,正是因为它在深处有成千上万的根子,但现在所谈的根本不是这一点。就“在深处的根子”这一点来讲,即使现在也无法“捕捉”我们,尽管我们的手工业方式非常盛行;虽然如此,我们大家都在埋怨,并且不能不埋怨“组织”被捕捉的情况,这种情况破坏了运动中的任何继承性。你们既然已经提出了组织被捕捉的问题,并且不愿离开这个问题,那我就告诉你们: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蠢人困难得多。无论你们怎样煽动群众来反对我,说我搞“反民主制”等等,我还是要坚持这个意见。在组织方面,正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聪明人”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至于他们是从学生中还是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因此我认为:(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

请我们的“经济派”、恐怖派和“经济派兼恐怖派”来反驳这几点吧,我现在只想谈谈其中的最后两点。捕捉“十来个聪明人”和捕捉“百来个蠢人”的难易问题,可以归结到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个问题:在必须严守秘密的条件下,是不是可能存在群众性的组织。我们永远不能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没有这样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争。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这并不是说他们将“代替大家动脑筋”,并不是说群众不必积极参加运动。恰恰相反,这些职业革命家将从



群众中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因为那时群众就会知道，单是几个学生和几个从事经济斗争的工人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多年的时间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那时群众就不会一味为手工业方式“动脑筋”，而会为这种培养工作“动脑筋”了。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是说要把运动的一切职能集中起来。最广大的群众积极参加秘密书刊工作，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加强起来。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使阅读秘密书刊，为秘密书刊撰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散发秘密书刊的工作都几乎不再是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很快就会懂得，对散发的成千上万份出版物中的每一份都要履行一套司法和行政的公事程序，是很愚蠢的而且是办不到的。不仅报刊如此，而且运动方面的一切职能，直到游行示威为止，也都是如此。经过考验的、所受的严格专业训练不亚于我国警察的“十来个”革命家，把一切秘密工作如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各城区、各工厂区、各学校指定领导人员等等集中起来，这不但不会使群众最积极最广泛地参加游行示威这件事受到损害，反而会使它得到很大好处（我知道有人会来反驳我，说我的观点“不民主”，我在下面就要详细来答复这个极不聪明的反驳）。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中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

的确，这种认识已经极其模糊了。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主要过错，就是我们由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而败坏了俄国革命家的威信。一个人在理论问题上软弱无力和动摇不定，眼界狭小，用群众的自发性来为自己的萎靡不振辩护，他与其说像人民的代言人，不如说像工联书记，他不善于提出广泛的大胆的计划来使敌人也肃然起敬，而且在自己的专业技巧即同政治警察作斗争方面没有经验，笨手笨脚，——对不起！这样的人决不是革命家，而只是可怜的手工业者。

请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都不要埋怨我用这个苛刻的字眼，因为这里讲的是缺乏修养的问题，我用这个字眼首先是指我自己。我曾在一个给自己提出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中工作，我们所有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痛切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可以把一句名言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后来我愈是经常回想起我当时感到的内疚，就愈是痛恨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用他们的宣传来“玷污革命家的称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

##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1905年)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出版物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有灭绝。还远远没有灭绝。我们首席大臣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还在“非法地”出版,但是,政府愚蠢地企图“禁止”它所无法阻止的事情,除了给政府带来耻辱、带来道义上新的打击以外,是不会有有什么结果的。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而又非常虚假,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由那些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派属性是不准许有的),但又都“倾向”于这个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假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观点,实际上还不是党的人,他们认识肤浅或者思想畏缩,另一些人想表达党的观点,出于无奈而吞吞吐吐,这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了。

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有生气的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但是无产阶级暂时为俄国只争得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蔽的、“外交式的”、支吾搪塞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也反映在我们的报纸上:不管古契柯夫先生如何嘲讽社会民主党的专横,说它禁止刊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温和报纸,但事实终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仍然被排斥在警察横行的专制俄国的大门之外。

不管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即着手新的工作安排。出版物现在有十分之九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为党的出版物。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会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喻大叫大嚷,说这样就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它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写作事业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同其它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写作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完成。我们决不是宣传某种划一的体制或者宣传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里是最来不得公式主

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解决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写作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是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许某个热烈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们想使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你们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你们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这里说的是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定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要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们的党立即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刻，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参加我们的党。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盘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第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摘掉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

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

动手干吧，同志们！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伟大的和容易收到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紧密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写作事业。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着手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局面，使它们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完全参加到这些或那些党组织中去。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版物才会名副其实。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也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 什么是“互利共赢”以及它如何剥削全世界人民

葛兰东·普鲁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又极大地鼓舞和支援了亚非拉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帝国主义的旧殖民体系瓦解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空前提高，生产规模日益庞大，同时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帝国主义绝不能失去殖民主义，他们反而更需要殖民地了。新的形势迫使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改变策略，它们为了维持和加强殖民统治，采用了新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还是殖民主义，它只不过抛弃了好几个世纪以前形成并遗留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殖民形式。资产阶级并不需要他们的老前辈用过的这些形式，只要能够赚钱，就完全没必要再考虑奴隶制之类的东西。仅仅是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甚至连殖民政府的成立都不再必要，因为经济上的剥削总是造成政治上的统治，不须你派人去，自有买办来找你。为此，资本家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他们把一直以来在自己祖国实施剥削、掠夺、统治和奴役的“仁慈”办法，搬到了殖民地。这一套办法，我们唤作“新殖民主义”。

这种新殖民主义相较于老殖民主义看起来“和平”了不少，似乎是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眼前，但它的核心内容完全是不变的。英帝国主义踏上中国土地时，是以侵略者的面貌出现的。它通过军队开路，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强开五口通商并建立租界。而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源自一件事——鸦片贸易与禁毒斗争。东印度公司的利润是他们铤而走险的直接目的，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对此表示拒绝，所以垄断资本家就要派侵略军来开辟赚钱的道路。

可是在今天呢？不难发现，在那些弱国、穷国、小国，像清政府这样“未开化的野蛮人”早已不复存在了。这就是说，不管你是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还是什么别的公司，买办资产阶级都欢迎你到我们“发展中国家”置办产业。既然如此，就完全没有理由不放弃过去那种肮脏又血腥的殖民主义。从老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转变实际上相当于蜕了一层皮，利润作为核心目的得以暴露，挡在前面的障碍已经扫清，帝国主义便可以长驱直入，搞起一套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头的新殖民主义。

列宁写道：“我们是处在一个全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金融资本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金融资本的统治，是现代殖民政策的经济基础。因为“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新殖民主义和以往的殖民有所不同，列宁对此指出：“……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金融资本实现殖民奴役和掠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即“政治兼并”和“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所谓“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即打着维持落后国家和弱小国家政治独立的幌子，而使它们在经济上、财政上处于依赖、从属的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点，新殖民主义就以经济“援助”、技术“援助”、“合作”开发等为幌子，并较多地由国家出面，通过贷款、投资、贸易等方式，继续和加紧对亚非拉国家进行大量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掠夺这些国家的资源，剥削其廉价劳动力，倾销过剩商品，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其中，特别是由国家出面进行的经济、技术“援助”，既掩盖了资本输出的掠夺实质，使帝国主义国家处于“恩赐者”的地位，以进行收买，又为资本输出开路。表面上以“合作”开发、平等互惠、互利共赢为名，实际上附有苛刻条件，从而获得和确保种种特权，使受“援”国受到财政、金融、经济以至政治、军事上的控制。

列宁还说：“给予个别小民族以尽可能多的民主自由乃至实行国家独立，这不仅是‘能实现’的，而且往往是对托拉斯，对它们的帝国主义政策，对它们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直接有利的”。可见这种独立只是形式上的独立，而“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

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从而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之后，不仅利用“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等枷锁，在“国际分

工”、“生产专业化”等名义下，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变成了它直接控制的经济附庸国。而且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援助落后国家”的招牌，极力向亚非拉地区渗透扩张，甚至出钱出枪，直接帮助印度等国家的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扑灭亚非拉地区的人民武装斗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面的特权苏修与美帝互相争斗，相互勾结，二者沆瀣一气，成为二次大战之后统治世界的两大堡垒。

而在苏修破产灭亡之后，新兴的中修社会帝国主义走向崛起，搞起了美国当年那套以所谓“填补真空”的手法，试图逐渐取代老牌帝国主义。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打着“援助”、“合作”、“互利共赢”、“多边主义”、“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数不清的旗号，甚至专为资本输出成立了一个“亚投行”，去亚非拉各“一带一路沿线”国、各“战略合作伙伴”国和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国输出资本，取得土地租借权、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采权以及财政、金融方面的特权，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开办纺织、制鞋等轻工业，大搞跨国公司，压榨亚非拉人民的血汗。这些资本输出就像血管一样插到了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吮吸着巨额利润中修还在各国开采各种矿产，大量掠夺资源，并通过直接投资经营采矿业和种植园、农场，通过贸易协定攫取所需要的食品和原料。尤其在非洲开辟了不少乔装打扮成“贸易港口”、“产业园区”的租界，在吉布提甚至有军事基地。中修在修建基础设施上更是做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受“援”国从交通、电信到能源等等设施，无不处于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中。

而中修却恬不知耻地说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给世界人民带去幸福的，就好像英帝国主义来大清国修铁路也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的那样。中国垄断资本如何去亚非拉各国“援助”和“合作”，即便不是为了今天的利润，那也是为了明天的利润。资本输出虽然对经济落后国家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刺激作用，但帝国主义决不是要给穷国、弱国的人民带去福音。恰恰相反，垄断资本家输出资本到经济落后国家，正是为了利用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榨取比在他们本国更高的垄断利润，掠夺这些国家的资源，打击和破坏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阻碍其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的经济地位，成为他们剥削和奴役的对象。这种“援助”量到了今天如此惊人的规模，以至于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二大资本输出国，仅次于美帝国主义。

中国作为所谓“世界工厂”也并不能妨碍它同样是世界第二大霸主的事实，就像英国和美国在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输出国那样。英国也被曾经称为“世界工厂”，一直到美国取代它并占据世界最大商品生产国的地位，美国已经保持世界最大生产国的地位一百多年，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从帝国主义大国变成了世界上的唯一霸权超级大国。

如果说资本输出直接导致的是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给广大亚非拉人民送去令人暖心的“就业岗位”或者说被压榨的机会，那么这种“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实质上就一定会造成政治上的附属关系。金融寡头的统治和资本输出的扩大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各国的最大垄断组织和国际垄断同盟争夺、瓜分世界市场，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而且也必然会引起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争夺霸权、瓜分世界。

帝国主义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之后，就必然又重新分割。列宁指出：“世界分割完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所谓完毕，并不是说不可能重新分割了，——恰巧相反，重新分割是可能的、不可避免的”。十九世纪末，世界领土被“分割完毕”之后，人们又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领土被不断地重新分割。每一次瓜分世界领土，殖民地的分割总是不平衡的。殖民地分割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差别，因为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主要是按资本、按实力进行的。列宁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有些国家发展较快，有些国家发展较慢，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不断变化的。殖民地的分割不平衡便与列强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矛盾。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要求得到更多的殖民地，然而世界上无主的土地已经没有了，只能从走向衰落的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去抢夺殖民地，这就激化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是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俄帝国主义正在进行这种战争，将来要发生的与之相同的事情，实际上完全是可以预料到的。

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甜言蜜语有的掩护之下，疯狂地向亚非拉地区进军，通过资本输出在经济上瓜分世界，这就意味着它势必将要加入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领土的争斗。各个老牌帝国主义列强正在走向衰落，新兴的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则开始步步紧逼。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必然导致重新瓜分世界的激烈争斗，中修叛徒集团鼓吹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是梦想着走向超级大国的口号，在这狂欢的呼声之中，处处暴露着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头的新殖民主义罪恶统治的龌龊与肮脏。

# 工人课本

## 劳动群众创造一切

大家都知道，人们要生活就必须得吃饭、穿衣、住房子等等。但是食品、衣服、房子这些物质生活资料是哪来的呢？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举个最明显的例子说，我们每个人天天都要吃饭，粮食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生产粮食，需要有土地、农机具、种子、肥料等等，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凭空生产出大米或面粉来。但是，我们仅仅只有土地、农具、种子、肥料，如果没有农民或者农业工人的劳动，农具或者农用机械又不能自己去翻开土地，肥料不能去肥田，种子不能自己长出粮食来。所以，有了土地、农机具、种子、肥料这些生产资料以后，还必须经过农民或农业工人的劳动，利用这些生产资料，播种施肥，春耕、秋收。这样我们才能最后得到粮食。可见，如果没有劳动，生产资料就是死的东西，生产是不能进行的。而且，这些生产资料同样是劳动人民制造出来的。所以，劳动是一切生产中决定的因素，没有劳动，人们就不能生活和生存下去，人类社会也就不能存在。进一步说，人类和猴子、猩猩一类动物是最相似的，可我们人类有思想、有文明，而猴子只是牲口。人和猴子的区别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猴子只是食物、工具的采集者，而我们人类是食物、工具的制造者。就是因为我们人类能够劳动。

因此，我们说，是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所以能不断地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能力在进步，是生产力在进步。所以，我们说，劳动人民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创造者，还是历史的创造者。

## 两个阶级怎样诞生

在远古时代，群居的人类不得不结成氏族部落关系生活，平等地进行劳动。因为这是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如果不这样，大家都会饿死。而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人类掌握的生产技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进步，生产力是逐渐得到提高的。直到后来，原来需要一个部落共同完成的劳动，这时一个家庭就可以完成了，财产从部落集体占有变成了私人占有。各个家庭之间劳动能力有高有低，出现了贫富分化。而氏族部落也在向外扩张，各个部落之间起了冲突。冲突中战败的人沦为了奴隶，富裕的人生产资料多，变成了奴隶主。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就被分离了。生产资料被奴隶主阶级所占有，奴隶则没有生产资料。所谓阶级关系，就是一些人能无偿占有另一些人劳动成果的关系，劳动阶级为了生存就要被剥削阶级奴役。这样，在生产过程中就产生了人剥削人的关系，产生了两个敌对的阶级。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不仅占有了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而且占有了奴隶本身，奴隶主凭着这个关系，不但强迫和压榨奴隶的劳动，并可以自由出卖或任意杀害奴隶。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掌握了土地和政治上的特权，劳动农民没有或缺少土地，为了租用土地，就不能不遭受地主阶级凶残的剥削和压迫。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掌握了厂房、机器这些生产资料的是资本家，劳动的是工人。表面看来，资产阶级好像和无产阶级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但由于资本家断了一切基本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广大工人群众没有生产资料，穷得除了自己这个劳动力以外便一无所有，所以被叫做“无产阶级”。为了饿不死，无产阶级只好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做资本家的雇佣工人，资本家就从工人的劳动中贪得无厌地进行最残酷的剥削，并通过国家、警察、军队甚至思想、文化等等一切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生活上无保障，日子越过越苦。而那些资本家，成年不劳动，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他们过着花天酒地、腐朽糜烂的生活，财产却越来越多，“富可敌国”从夸张的形容变成了现实。

有人说，我们中国到今天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还是“当家做主”的，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可劳动人民在辛勤工作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见到他们成为工厂的主人？为什么他们享受不了任何民主，只能接受雇主命令？为什么是老板肆无忌惮的欺负人民，而人民不能实施对老板的专政独裁？社会主义学说的开山鼻祖马克思曾经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就讲：“……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你瞧，这“社会主义”

哪里为人民服务？到处都是为赚钱服务。中国完全就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资本主义社会。

世界上的一切物质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但在阶级社会里，劳动人民创造来的财富绝大部分都被剥削者掠夺去了，留下给他们的是什么呢？只是贫穷和痛苦的生活，而劳动这个人类独有的技能，却成了沉重的负担。

## 劳动力变成了商品

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商品王国，在这里，一切都是商品。商品和产品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商品生产出去是要卖的。纽扣厂制造纽扣，然而，生产这些成千上万的纽扣，不是为了把它们缝在纽扣厂厂主的背心上，而是为了出售。啤酒厂生产啤酒，可啤酒厂厂主总不能把他生产的啤酒全喝了。所以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切，都是为了卖出去而造出来的。连咱们工人的劳动力，也成为了商品，这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个重要前提。

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劳动者是“自由人”，所谓“自由人”，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不受任何拘束或限制地当作商品来出卖，“自由的”受到雇佣，而不像从前的奴隶或佃农那样被锁链束缚；第二，劳动者还必须是“自由得一无所有”，以至于不给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可能第二天就要饿死。资本家总是这样说：“不愿意吗？那就别干，谁也不强迫你。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工人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资本家有购买劳动力的自由。可是，工人和资本家显然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对于工人来说，他们没有其他出路，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因为像厂房、机器、原料、货仓、商店、房屋、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土地……等等这些，总之，凡是生产上不可缺少的一切，都被大富翁们牢牢抓在手里。资本家雇用工人，就是购买工人的劳动力，相当于用一条无形的锁链，栓住了“自由的”工人。

既然是商品，就会有商品特有的属性，那么商品有什么样的特别属性呢？“价值”和“使用价值”。既然是用来卖的，那任何商品肯定都有使用价值，这是很好理解的。大米种出来是为了吃，衣服造出来是为了穿，而劳动力呢？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用来劳动。很明显的，一样东西，如果对别人没有使用价值，没有人需要它，它就不能成为商品。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一个基本属性，但并不是唯一的属性，并不是一切有使用价值的东西都是商品。比如空气、阳光，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但它们不是劳动产品，人们可以自由享用，所以就不是商品。又比如，粮食、蔬菜，虽然是劳动产品，但如果是农民自己生产供自己食用的，那也不成其为商品。再比如，封建制度下的农民，把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向地主缴纳地租，这些粮食虽然不是农民拿来供自己消费的，但它是无偿交给地主的，并不经过买卖交换，所以也还不是商品。

可这个“价值”是什么东西？它和使用价值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知道，买卖的过程是需要衡量比对两种产品的交换比例的，比如五瓶水能换一桶方便面。这种交换比例是怎么来的？很显然，各种商品能如此交换，说明它们之间必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显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你很难说水和方便面比谁会更实用，这完全取决于你是渴了还是饿了。我们刚才说，商品的特性是价值和使用价值。而各种商品，布也好，米也好，把它们的使用价值撇开，他们就只剩下了一种性质，那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而且它们都具有价值这个属性。在生产它们的时候，都耗费了人的劳动。我们说，劳动创造一切，价值来源于劳动，劳动是使价值形成的关键。各种商品在价值量上就可以互相比较了，十瓶可乐所以能够换十斤米，就是因为生产十瓶可乐和生产十斤米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同样地，天然钻石在使用价值上，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没什么用的，但是由于开采它而耗费的劳动非常多，所以就卖的特别贵。而劳动力的价值，就来源于生产出劳动力所耗费的劳动。所谓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其实就是工人的衣、食、住、行和接受职业教育的过程。工人们刚刚结束了工作。他们精疲力竭，已不能再做工了。他们的劳动力几乎消耗完了。要恢复他们的劳动力，需要什么呢？需要吃喝、休息、睡觉，维持他的身体，以便“恢复自己的精力”。只有这样，才会有继续做工的可能和能力，或者说才会有劳动力。工人的消费就是劳动力的生产。

劳动力成为了商品，具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种属性。正因如此，资本家才能够剥削工人的劳动。

## 资产阶级压榨工人

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以后，就迫使工人到资本家开的公司去做工，为资本家生产商品。工人劳动的过程，就是价值增殖的过程。比如，把水泥、沙子、钢筋等等原材料的钱、机器的钱和付给建筑工人工资的钱都加起来，最后还是没有盖出来的房子卖出去的钱多。这些多出来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显然是从工人的劳动来的。

工人的劳动时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剩下的叫剩余劳动时间。全社会的工人完成了

这一部分必要的劳动，就可以保障自己不被饿死，但是由于工人的劳动力被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时间是资本家决定的，所以就会出现剩余劳动。假如资本家张三雇佣工人一个月劳动力，付工资 2000 元，让工人一天劳动 12 小时。而工人 4 个小时的劳动量就产出了足以维持生计的，相当于自己的工资那么多的价值量。资本家可不愿意养活饥饿的工人，资本家不要亏本买卖，所以他们会让工人再干 8 小时，把机器损耗的钱赚回来，最后还多出好多钱。这 8 小时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工人生产的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张三每个月就能从这一个工人身上捞回来 4000 元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工厂越开越大，财富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大大超过劳动力价值的这个差额，被资本家剥削去了。不难看出，工资就是对劳动者的明码标价，雇佣劳动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血汗的方法。

资本家的本性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社会又是“大鱼吃小鱼”的。每个资本家要在竞争中打败他的对手，就必然会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增加剩余价值的数量，就要加深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叫剥削率，它等于剩余劳动除以必要劳动，剩余劳动的时间相对越长，剥削率就越高。还以资本家张三举例，假设他依然付给工人工资 2000，但强迫工人工作 16 小时。工人维持生计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此时差不多还是 4 小时，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却从 8 增长到了 12 小时。如果按先前 8 小时剩余劳动计算，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率剩余劳动时间 8 小时除以必要劳动时间 4 小时， $8 \div 4 = 2$ ，剥削了两倍，而现在就是  $12 \div 4 = 3$ ，剥削的程度从两倍涨到了三倍，现在资本家能赚 6000 块钱了。

这是资本家加深对工人的剥削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延长劳动时间。用这种办法榨取的剩余价值，我们叫做绝对剩余价值。但是工人再怎么加班，总要有吃饭、睡觉的时间，劳动时间怎么也延长不到 24 小时。所以资本家就会在同样的时间里，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这样榨取出来的剩余价值，实际上和延长劳动时间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绝对剩余价值。

资本家还有另一种方法，榨取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是由于科技的进步，生产工具的改进，使得生产这些消费品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减少了，这样，就使工人维持生计所需的价值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相对地增加了剩余劳动。如同我们上所举的例子，工人及其家属每天必须消费的生活资料，是由 4 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所创造的，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是 4 小时，如果现在粮食业、日用品制造业等等行业的效率都提高了 1/4，只要 3 小时的社会必需劳动时间就可以维持工人的生计，再生产出劳动力。这样，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也就从 4 小时减低为 3 小时。这时工人虽然仍是劳动 12 小时，但因为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已经减低为 3 小时，剩余劳动也就增加为 9 小时，资本家的剥削率也同样由 2 倍提高到 3 倍。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进步，科学的发明，新机器的采用，效率的提高，并不表示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痛苦的减轻；相反地，一切科学发明，都变成了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

而由于资本的不断积累，世界上早就出现了垄断资本家，甚至出现了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我们管这个就叫帝国主义。他们不再需要总是为改进科技而发愁，仅仅靠着在行业内的一家独大，就能得到高额的垄断利润。有的甚至会把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拿出一小部分再分给工人，以此收买人心。比起自己得到的垄断利润，他们少剥削的那点小恩小惠，还不是本来就应当属于工人。常常听到有人说什么国企员工的待遇好，要给国家感恩，这就是中了资产阶级的鬼把戏。

有人要问，那资本家要是亏本该怎么算？其实一个资本家做了亏本买卖，无非就是让另外一个资本家赚的盆满钵满，利润在资产阶级中间跑来跑去，怎么也到不了工人手里。那骗人赚来的钱呢？剩余价值的产生也不能靠骗人来说明，毕竟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建立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上。

## 到底是谁来养活谁

人们常说：“工人如果没有工做，得不到工资，工人就不能生活，就要死，所以工人是资本家养活的。”但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事实证明，绝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恰恰相反，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世界上如果没有工人，资本家就不能存在，资本家手里的百万财富，无非是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血汗积累起来的。

资本家要追逐利润，就要扩大生产，就必须把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积累起来转化为资本。资本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资本家手里的财富也越来越多，这些无一不是工人的血汗。也许有人会说，资本家最初的资本也许是他们辛苦劳动积累起来吧！这样，我们就要来谈谈资本家的发家史。



## 掀起大浩劫的历史

资本主义是在小商品生产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建立在小生产者贫困破产的基础上的，这是极其残酷的。拿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来说，在 15 世纪末期和 16 世纪初期，羊毛纺织业在英国已经开始发达起来，当时已经成为资本家的封建贵族，因为生羊毛能够赚到大钱，就用强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拆掉他们的房屋，将农民的耕地变成牧场。农民倾家荡产以后，只好成群结队地到城市里流浪，被迫去给资本家打工。许多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对落后地区的部族和人民进行了海盗式的掠夺，他们杀害和贩卖美洲、非洲和东西印度群岛上的土著居民；发动“鸦片战争”打破了我国清朝的海禁；为了掠夺殖民地，他们不断地进行了血腥的战争。我们只要翻翻这些现在所谓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账，就可以看出它们的祖宗都是干着这些罪恶勾当的。而我们中国现在的资本家的发家方式，和英国人可不一样。

中国是 1949 年建国的，1956 年经过了三大改造就消灭了资本家。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带领中国的工人、农民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无产阶级的专政，劳动人民是真正当家做主的，最终还要走向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年代，实行的是“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就是即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就是干部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者的结合。在这个年代，工人不仅不怕厂长，还可以批判厂里的问题，参与工厂的管理，学文化、学技术。就算是食堂师傅给厂长多盛了一勺菜，第二天这两个人也要挨批斗，被撤职。工人们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大锅饭，可不像今天一样被饥饿的锁链栓住，被迫给资本家出卖劳动力。无产阶级不再是机器的附属品，而是变成了工厂的主人。我们从人剥削人的旧社会，正在走向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

可惜，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里刚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它不免要带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和痕迹，所以还会有人像资本家一样利用自己的权力追逐利润，没落的资本家阶级和腐败的干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会企图千方百计地倒退回万恶的旧社会。伟大导师列宁在俄罗斯和欧洲东部建立的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时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随即开展对苏联的批判，得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热烈赞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的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的胜利果实，我们前面提到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这一类制度，正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推广。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窃据党政军大权的是华国锋，他全面恢复了“利润挂帅”，也像资本家一样追求起来利润，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经济就全面倒退成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国家变成了当时唯一的资本家，最大的资本家，华国锋是使今天工人重新变成雇佣奴隶的罪魁祸首。接替华国锋的是邓小平，他是导致今天工人受苦的重要元凶。邓小平一方面在城市允许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在农村搞分田单干，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官僚子弟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大量窃取当年工人当家做主时创造的财富，纷纷成为资本家。而农村一夜之间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进而大量农民迅速破产，被迫进城给资本家打工，与此相对的是盘踞在农村农业资本家和乡镇企业主。工人、农民的祖国就这样被资本家、寄生虫和无耻走狗占领，而与此伴随的是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全方位的大倒退，社会治安大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娼妓、毒品、邪教等等纷至沓来。中国资本家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浩劫的历史。

有人诟病当年的生活水平低下，人民的生活并不好过。可我们知道，生产力是不断地在发展的，如果再往前推几十上百年，就是清朝皇帝他也不能每天冲个热水澡，再往前推几千年，就算是周天子也不得不把猪油拌饭当成八道大菜之一。难道我们现在比当年皇帝过的还好？我们要反过来问，资本家卷土重来了，工人的生活就好过了？非得要资本家卷土重来了，工人的生活才能好过？

## 惩戒全世界的野心

外国资本家的发家史，比如英国这种帝国主义国家，就是靠成天压榨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建立和争夺殖民地，它曾经就侵略过我们中国。上个世纪，日本帝国主义也侵略过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少不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功劳。它们侵略的目的是什么呢？和资本家的本性一致，无非还是为了利润，因为所谓“帝国主义”，实质就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家在国内捞不着更多的利润了，就跑出去压榨落后、弱小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使其沦为大国、强国的殖民地。而当地的人民并不欢迎帝国主义势力，比如中国当时就有义和团运动进行反抗。而到了今天，去一个殖民地压榨财富一般就不再需要战争，因为那里的国门早就在上个世

纪被打开了。现在的资本主义是世界的资本主义。一切国家都互相联系着：互相有买卖关系。现在地球上没有一块地方不受资本统治，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己生产所有的东西。

我们前面提到，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第一步，就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变成像美国那样，甚至比美国还要厉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二部则是到处大发不义之财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有的就成了掌握着大公司的垄断资本家。他们也会把自己的资本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亚、非、拉等等贫困地区，这肯定不是去做慈善了。虽然打着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号，但实际和他们在国内干的事情一样，这是过去压榨当地人民的血汗，掠夺当地的资源，对当地人民进行政治上的统治。亚非拉各国人民和我们受着一样的苦，都遭到了中国资本的重重剥削和压迫，叫苦不迭。所以中国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且由于它自称社会主义，实际是假社会主义，我们管这个叫“修正主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简称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中修叛徒集团头子习近平鼓捣出来一套假装天下大同的狗屁学说，恬不知耻地高喊“为人民服务”，对内加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对外加紧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而且，中国资本输出到这些地区，就会造成新兴的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与国际上几个大国争夺势力范围，企图重新瓜分世界，迟早要引发帝国主义战争，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战争就是这样引发的。我们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既爱好和平，又不甘屈服于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势必要进行最彻底的反抗，推翻把世界搅合得不得安宁的资本家、帝国主义！

###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垄断资本家为了追求垄断高额利润，加紧剥削和掠夺工人，使亿万劳动群众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垄断资产阶级采取各种血汗劳动制度，提高劳动强度，恶化劳动条件，肆无忌惮地不断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它们打着所谓经济“援助”的幌子，妄图达到奴役被压迫民族的阴险目的，通过“援助”，保护它们在受“援”国的投资和其他利益，并取得进行新投资的特权，大肆掠夺被压迫人民的财富。为了实行政治控制，就扶植傀儡，驻扎军队，设置军事基地；为了便于经济剥削，就强制开辟通商口岸，控制海关和对外贸易，垄断金融和财政，强行夺取开矿、开厂和内河航运等特权。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攫取垄断高额利润，残酷剥削和压迫全世界无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使帝国主义和工人阶级、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

资本家发财致富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走向贫困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化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分散的、规模狭小的个体生产变成了社会化的大生产，直到形成垄断的资本主义。生产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机床、汽车、棉布、皮鞋等等产品，都是许多工人共同劳动的结晶，谁都不能再说：“这是我的产品。”

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并在资本积累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强大和觉悟起来。资本积累的发展，使无产阶级队伍逐步扩大社会化的大生产，锻炼了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促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阶级斗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性的阶级。在资本积累的进程过程中，生产社会化的巨大发展，必然达到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满怀信心地宣布：“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中修和美帝狼狈为奸，剥削、压迫全世界人民。资本显然是一种国际上的“黑暗势力”，那么想要打倒它，就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只要我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就一定能推翻每个国家的剥削者、统治者，奔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毛主席教导我们：“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一定胜利，历史的规律不可违抗！

## 中俄两帝在侵乌战争中的新“神圣同盟”

### 4.9

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开打一月有余，俄军在战场上日渐支绌，俄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军事冒险事实上已经失败。截止三月底，按各方最小口径算，已有超过 1000 名平民、3000 名士兵直接死于战争，按最大口径算，死亡平民接近 7000 人，士兵则超过 2 万人。乌克兰大地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绞肉机。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场侵略战争，不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而是因为战争性质是无产阶级在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俄国的新沙皇将无产阶级送上战场流尽鲜血来进行军事冒险，各国的统治阶级也纷纷借机利用民族情绪来欺骗和分化人民。

战争已然成为检验各国政府成色的试金石，中国的特色黑帮政府在外交上一贯以和平反战的伪善面目欺骗群众，那就让我们好好来看看，这个喜欢鼓吹“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世界和平捍卫者”，在这场不正义的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 1. 开战前

近年来，“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情谊自然被选择性遗忘），两国独裁者保持年均五次以上的见面频率，黑帮使用“上不封顶不设禁区，世代友好没有止境”等说法来极尽赞美新时代的“神圣同盟”。在战争爆发之前，特色黑帮主要为它的好兄弟做了这样三件事：

第一，经济支持。自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俄国对中国经济依存度日益上升，中国成为俄国第一大进口国和出口国。2021 年中俄贸易额将近 1500 亿，并且增长极快，同比增长 36%。俄国向中国出口大量石油、天然气和粮食，进口电子、机械等工业产品。此外在军火贸易、远东开发、金融服务等方面中俄存在广泛的利益合作。在俄国已在酝酿战争的今年 2 月初，中俄发表联合声明，签订一系列政治经济协议。在开战前七天，俄国宣布要向中国出售 1 亿吨煤炭，合同价格 200 亿美元。在开战前数小时，中国海关总署宣布放开对俄罗斯全境小麦的进口（俄国是世界第一大小麦出口国，过去由于病虫害中国只允许俄国七个城市的小麦进口）。以上种种，我们不能不认为，特色黑帮为普京政权维系国内独裁、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经济支撑，黑帮进口的每一桶石油都变成了倾泻在乌克兰人民头上的炮弹。

第二，舆论掩护。自去年 10 月以来，俄国就陆续陈兵乌克兰边境，俄乌边境形势紧张，今年 2 月初英美多国都提示俄国处在发动战争的边缘。而特色黑帮则为俄国竭力掩护，大撒烟雾弹，声称西方情报并不可信，战争不会爆发，美国是在“拱火”和“渲染战争威胁”。2 月 21 日，普京选在冬奥会结束的第二天发表战前讲话，下令部队进入乌东地区，24 日下令全面入侵乌克兰。时机选择如此巧合，人们很难相信普京政权没有和特色黑帮达成默契。既然黑帮在外宣上尽心竭力，普京大帝也愿意给足面子，竭力不破坏特色黑帮的冬奥作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今年 1 月以来西方国家就开始撤离外交官和侨民，而中国迟迟不发布相关提醒，在战争爆发后将数万留学生和华人华侨滞留在战火中。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声称贴上中国国旗可保平安（结果反而招致乌克兰群众反感），有理由推测特色黑帮相信了俄军的速胜预期，认为俄军能迅速攻陷基辅，并得到了俄军的安全承诺。以上种种，我们不能不认为，特色黑帮是在千方百计为俄国发动战争打掩护，甚至不惜以数万乌克兰侨民的生命为代价，来配合普京进行政治表演。

第三，默许调兵。今年 2 月初俄国以俄白联军演习的名义，在乌克兰边境持续增兵。据中国媒体公开报道，为了这次演习俄国甚至“东兵西调”，从六千公里之外的远东地区调动了数万军队。据外媒观察，俄国在中蒙边境上的驻军数量因此减低到了 1922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远东地区所隶属的俄军东方军区，主要职责就是驻守俄中、俄朝边境以及保护与日本存在争端的“北方四岛”。暂时没有资料显示这些远东部队是已经参战，还是作为

预备部队存在，但显然我们有理由认为，俄军为侵略乌克兰所做的军事部署早就为特色黑帮所注意，甚至得到了特色黑帮的默许和对俄国远东边境的安全保证。

## II. 开战后

战争爆发以后，特色黑帮更加忙碌了起来，一方面它要在外交场上为俄国敲锣打鼓，一方面它要打压国内反战声音，用民族主义情绪欺骗群众，同时不忘为它的俄国兄弟提供技术支援。

第一，外交维护。战争爆发以后，特色黑帮在外交立场上表面中立，声称“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对话谈判化解危机”，但都是玩弄外交辞令。开战后第二天，中国的大独裁者就给俄国的大独裁者电话慰问，外交部长则表示“理解俄方在安全问题上的合理关切”；黑帮不将俄国对乌克兰的全面进攻称作“入侵”而称之为“俄乌冲突”，刻意模糊战争性质；在联合国关于制裁俄国的一切实质问题上，黑帮都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在战争责任上黑帮一个劲地强调“乌克兰问题有复杂特殊的历史经纬”，将全部责任甩给美帝和北约东扩，而对战争发动者没有只字指责。

第二，舆论统制。黑帮在舆论场上同样不敢公然支持侵略战争，表面继续维持中立伪善面孔，暗里用软硬两手管控和引导舆论。硬的一手是打压国内各种反战反俄声音，进行大规模删帖封号，限制言论自由。软的一手是开动强大的宣传工具，释放各种鼓吹俄军实力强大、速战速胜的信号，配合俄军在全球范围打信息战。甚至不惜篡改外媒报道，公然炮制假新闻，用卑劣伎俩欺骗群众。黑帮也发现这是个利用民族主义加强专制的大好时机，极力鼓动亲俄反美情绪，有意引导民间讨论台湾问题，通过美化侵略战争为将来可能的武力侵台作铺垫。黑帮教育部还试图组织全国各地进行思政集体备课，他们当然不敢讲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只能复读民族主义话术愚弄青少年。在俄国将美国在乌实验室炒作为生化武器实验室后，黑帮如获至宝，继德堡造毒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疫情阴谋论，而该实验室文件已在网上公开，主要目的是观察候鸟携带的常见病毒。布查惨案发生后，黑帮口头上说要调查真相，明里暗里指责乌克兰自导自演，利用国内群众信息闭塞（正是被黑帮封锁）和对屠杀平民的深恶痛绝来倒打一耙。

第三，技术支援。据国内媒体公开报道，在俄国遭遇国际黑客的网络攻击后，具有半官方背景的电信巨头华为，紧急“驰援”俄国。不仅开展网络维护，建立移动宽带系统，还要建立 5 大研究中心，为俄国培训 5 万名网络技术专家，帮助俄国建立视频监控和人脸识别系统（应读作警察监视系统）。这倒并不奇怪，同为黑帮自然乐于分享专制统治技术，而华为作为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标兵，早就在俄国深耕多年，2014 年西方资本撤出克里米亚后，填补空白正是华为和中兴，此时自然不吝效犬马之劳。

## III. 结论

中特的官方学者声称，“无论美国承认与否，北约已经实质性地参与了俄乌冲突”。没错，无论特色黑帮玩弄多少外交辞令，无论他们承认与否，特色黑帮也实质性地参与了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经贸支持、大额油气订单、默许东线调兵、战前不惜以侨民打掩护、战后在外交上竭力维护、配合打舆论战信息战、派遣华为提供网络支援。特色黑帮给普京提供了除武器军火和直接出兵以外的一切支持，而给战后的乌克兰只提供了区区五百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战争狂胡锡进最近鼓吹，若美国众议长洛佩西访问台湾，中国应大规模向俄国出售武器、增购油气。看来俄军的惨淡表现，已经引起了黑帮不满，恨不能亲自出兵。）

铁与血的事实摆在眼前，结论显而易见：中国的特色黑帮政府是普京政权发动侵略战争实实在在的帮凶和同谋，特色黑帮双手沾满了无产阶级的鲜血。两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共同屠杀了数万俄乌的无产阶级，共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布查惨案。

历史上的沙俄曾是“欧洲宪兵”，与普鲁士、奥地利等君主国结成“神圣同盟”，共同镇压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今天俄帝又在东方觅得了新盟友，新的黑帮同盟再次成为了世界上最反动的保守主义堡垒。回过头看，新“神圣同盟”的建立不是基于地缘关系的偶然，而是二十一世纪帝国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一个原因是中俄的垄断资本主义存在互补需求。俄国资本主义结构畸形，垄断资本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和银行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薄弱，只有能源、军工业发达，既需要中国作为能源和粮食输出市场，也需要中国输入电子和机械产品。而中国有庞大的工业规模，对俄国能源矿产需求强烈，并且近年来也在加大对俄直接资本输出。

第二个原因是中俄在对抗老牌的美帝国主义上具有一致利益。中帝需要俄帝冲锋在前，承担军事压力，为自

已在帝国主义争霸中获得更多发展余地。这一点上胡锡进说出了特色黑帮的心声：“俄罗斯不应倒，普京政权不应倒。一个稳定、独立、不买美西方账并敢与他们公开对抗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战略屏障”。只要中美争霸的基本格局不变，特色黑帮就始终需要普京政权。

第三个原因是中俄有着类似的政治经济结构，都建立了垄断资本主义之上的黑帮专制统治。中俄都曾是为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修正主义上台后腐化变质。只不过一个选择抛开苏联的历史包袱，实行直接的资本主义统治；一个选择保留社会主义外壳，实行隐蔽的资本主义统治。所以俄国是公开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国是隐蔽的资产阶级国家。俄国是落后衰朽的帝国主义，中国是新兴崛起的帝国主义。俄国的寡头集团直接垄断政治经济权力，由普京进行赤裸的独裁专制，中国的官僚垄断阶级则以人民名义控制生产资料，近年来也完成了开明专制向独裁专制的转变。

今年 2 月签订中俄联合声明时，特色黑帮宣称声明“集中阐述了中俄在民主观、发展观、安全观、秩序观方面的共同立场”，我们相信这是极其真诚的自白：中俄两国的统治阶级确实有着惊人的默契，都坚持打压民主的民主观、发展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观、维护统治阶级安全的安全观、消灭自由维稳至上的秩序观。

“普特勒”和“习特勒”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独裁者，他们惺惺相惜，臭味相投，因为他们都是操弄民族主义搞黑帮专制的高手，因为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垄断资本集团还存在深厚的共同利益。他们将继续勾结，进一步出卖两国的无产阶级。

而各国无产阶级也必须团结起来，用革命的同盟来对抗反革命的同盟。对于中国觉悟的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首先迫切需要在共同的革命纲领下联合起来，对专制政府进行政治揭露，教育群众认清特色黑帮反动凶残的真面目，将觉悟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从而使每一次危机都朝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转变。

革命是盛大的节日，战争则是残酷的教育。俄国侵乌战争是对未来帝国主义战争的一次预演，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这场深刻教育，将进一步团结起来，共同迎接盛大革命节日的到来。

## 特色帝国主义国际国内的典型景象

4.27

当地时间 2022 年 4 月 26 日下午两点多，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的卡拉奇大学内，特色帝国主义的孔子学院遭到了自杀式炸弹的袭击。袭击者雪莉·俾路支（Shari Baloch）属于一个名为俾路支解放军的民族主义组织，女性，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拥有两个硕士学位。袭击造成了四川师范大学派出的三名孔子学院的教师和巴基斯坦籍的司机身故。据说雪莉·俾路支在袭击前十小时曾在推特上发文告别，但现在笔者已经无法找到告别文，只能看到其推特上穿着民族风格服饰的温婉照片。俾路支解放军声明这是该组织的第一位女性自杀式攻击者。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幸福家庭的女性选择与三名中国教师同归于尽呢？是特色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正是特色帝国主义在巴基斯坦，特别是在俾路支地区的掠夺，引起了俾路支地区人民的反抗。根据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CISAC）提供的相关资料，俾路支解放军军事行动的目标是寻求俾路支省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避免俾路支省遭受外来的剥削和入侵。而特色帝国主义则是这种剥削和入侵的主要来源之一。早在 2003 年，俾路支解放军就攻击了参与当地基建的中国劳工。巴基斯坦政府在那个时候与正在走向帝国主义的特色政府签定了协议，将俾路支省的瓜达尔港租给特色政府四十年。特色帝国主义对当地自然资源的侵占不能不引起俾路支人的反抗。他们不仅仅仇恨充当傀儡的巴基斯坦政府，而且仇恨中国人。在 2018 年，为了阻止巴基斯坦政府与特色政府达成新的协议，俾路支解放军袭击了在卡拉奇的中国领事馆。对孔子学院的自杀式攻击，是这一系列针对特色帝国主义的攻击的延续，其反抗帝国主义的方面应该得到我们的同情。俾路支解放军无差别地攻击所有中国人以至所有的外国人则是不正确的。俾路支的民族解放运动，只有与特色帝国主义和巴基斯坦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而我们作为特色帝国主义国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支持特色的帝国主义扩张。应该鼓吹这样的观点：特色扩张对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仅毫无益处，而且会腐蚀中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中国工人应当支持受特色帝国主义压迫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而不能丝毫认可特色的民族主义宣传；特色外交部所谓“恐怖分子必将付出沉重代价”的叫嚣，只是其帝国主义政策的进一步延续而已。

在上海，群众反抗特色黑帮的防疫政策的斗争仍在继续。在复旦大学的学生抗议之后，同济大学的学生也被特色黑帮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封校一个多月、封楼二十余天之后，疫情并未消失，仍有阳性病例出现，而学生午餐的盒饭里开始出现了不能食用的猪肉。这些猪肉或者是积存已久的烂肉，或者已经生虫，或者是母猪乳头肉，引发了同济学子的愤怒。这让人不禁想起 1905 年 6 月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波将金号战舰的起义。当时的导火索也是由于食品供给带有污辱性，波将金号上的水兵因拒绝吃臭肉而与军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后起义。在日俄战争中惨败的俄国海军早已不满沙皇黑帮的独裁统治，而一月的流血星期日则撕下了沙皇“慈父”的伪装。在专制独裁统治下，无论是在沙皇俄国，还是在特色中国，都不会缺少这样的导火索。差别只是在于，今天特色帝国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慈父”伪装，还没有被撕下来。特色黑帮需要制造外部的敌人来掩盖内部的对立，不管这种敌人是其它国家也好，还是自然界的瘟疫也好，总之需要一种或几种威胁来欺骗群众，让群众把垄断资产阶级及其黑帮政府和自已想象成一个共同体。实际上，特色黑帮政府才是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最大的敌人。他们夸大病毒的危害，采取极端的防疫政策，对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毫不关心，不是因为偶然的过错，而是这个政权的本质的表现。那种认为中央的防疫政策没错，错的是地方政府执行不力的看法，没有看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权必然如此。

在湖北，一位单亲父亲让未成年女儿在烈日下挖藕带四个小时，拍成视频上传网络后成了热搜。在视频中这位父亲对痛哭的女儿反复说着一句话：“你吃不了读书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多数人生活困苦的来源，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读书，而是由于特色黑帮不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推行掠夺性的政策，而且在国内也是这样。绝大多数吃了读书苦的寒门学子，仍然要吃生活的苦，只不过脖子上的金锁链，一般来说更长一些罢了。这位从事个体种植的父亲，从经济地位上来讲属于小资产阶级，从思想意识上来讲同样如此：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进入小资产阶级的上层，甚至进入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行列。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意识，虽然大多难逃破产的命运，但是对特色黑帮维持其统治来说却是有利的。因此他们会大力宣扬这种意识，并用这种意识去腐蚀工人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不仅是要与特色黑帮的民族主义宣传做斗争，而且要与特色黑帮着力扶持的这种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意识做斗争。

最后，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卡拉奇孔子学院遇袭案中一位故去的教师身上。她叫丁沐舫，是个女孩，来自河南农村，1990 年生人，为广西大学汉语国际教育 2017 届硕士毕业生。其父是位卡车司机，家庭并不宽裕，求学过程也经历过挫折。她童年时吃过生活的苦，少年时吃了读书的苦，逝去时更是吃了没有政治意识的苦：她不能理解自己研究生毕业后为特色帝国主义的海外文化机构工作，客观上起了传教士的作用，结果成为当地民族主义者报复特色帝国主义掠夺行为的牺牲品。她不关心政治，认为自己只是在传播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她在自己的公众号“丁小木”的简介中这样写道：“小身体，大能量，莫慌张，献一己之力与世界，如己所愿过完一生；未来总有一天会发觉，我们为自己而骄傲，未来总有一天会见证到，中国梦的闪耀。”献一己之力去闪耀中国梦，实际上却是在助力特色帝国主义的扩张行为。如己所愿过完一生，只不过是下意识地按照特色帝国主义灌输的文化意识去牺牲自己。青年只有摆脱非政治观点，理解自己所面对的政府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实质，才能避免这种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在认识到这个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后，能够投身于通过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启发和组织工人阶级去进行推翻这个政府的斗争的人，将会成为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真正英雄。

# 牛马一生：养老问题与资本时代的社会再生产

巫吉

在这个时代，市场用物的尺度俯视众生，人不过是维持市场再生产的手段。但人的再生产总归不能如物的生产一般可迅即控制和支配，于是，人口就一直是一个甩不掉的问题。过去嫌人多，现在嫌人少，都是一个道理。

又是一年春天。万物滋长，生机盎然，鸟翔鱼游自在畅快，虫鸣蛙声不绝于耳。高尚的人们沐浴春光春景之间，睹物思人而反求诸己，又惦记起了人口问题。去年春末好不容易推行了放开三孩限制的政策，却没见着什么效果，各种歪招也陆陆续续地被提了出来，各自热闹了一阵。今年则新推出了一个叫做“个人养老金”的政策，说是能够为“养老”锦上添花，然而还是引起了老百姓的警觉。无论政策初衷如何，出台相关的人口政策总是显得有那么点儿吃力不讨好。

三胎政策也好，“个人养老”也好，它们只是人口“问题”的导火索，只是大家发泄平时积压在生活中的种种不满的宣泄口。这些不满来自这个时代社会再生产的矛盾运动和它带来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的种种艰难。唯有理解现实，才能从这些表面的情绪进入问题本身，才有解决矛盾的可能。

孩子的生养问题和所谓养老问题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人口老龄化常常被作为鼓励提高生育率的理由，而这些年来的低生育率也使得老龄化问题好像变得特别突出。许多地方出现了所谓的养老金缺口，还有些人不停地鼓吹延迟退休年龄，养老问题也这样就醒目地悬在人们生命历程的前方。这些所谓的人口问题总是被作为一系列问题提出来，然而，它们总归是一个问题，即社会再生产如何进行的问题。

—

一个社会总是要再生产出它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出它的生产关系，否则这个社会就不能持续地存在下去。譬如说，在农业封建社会，农民要种粮食，每年都要留足种子，要喂养好耕牛，要修理和新造农具，否则，来年的收成便没有了保障，人也就活不成了。这是生产力的再生产。当然，要成为一个封建社会，它还要不断地生产出农民和他的剥削者地主阶级，还要使这样的统治关系和剥削关系持续地被生产出来。它要使地契、田租、衙门和差役继续存在，使这种“天道”持续下去。总之，要使得生产资料、劳动者和生产关系持续地存在下去，这个过程就被称作社会的再生产。

在任何社会，生产要继续进行下去，便要不断地再生产出劳动者、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并再生产出生产关系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以雇佣关系为基础，没有了劳动力和产业后备军，这种生产关系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没有了基础。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尤为重要。这样，资本便要为了劳动者种群的存续而向劳动者支付工资。这个工资看上去是发给劳动者个人的，但事实上，却要发放给整个再生产中的无产阶级队伍，包括那些处在脱离了劳动关系或处在没有劳动能力阶段中的无产阶级。前者能够维持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使工资在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处徘徊，后者则关系到劳动力再生产本身。

人的劳动能力如同一道波浪，幼时未有，随年齿而增，至青壮年达到峰值，再长则再衰，年老又归于无。它的两端是童年期和老年期。在人年幼、年老和疾病这些在个体看来显得无助的阶段，如果没有来自他者的扶助，便没有幼儿、老人和病残人的生存可能，他们便无法完全地经历生命旅程。

儿童的抚养问题涉及到劳动力的再生产，无疑是包含在再生产费用中的。没有儿童，便没有未来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要作为一个阶级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使社会再生产得以持续进行，就必须使社会上的儿童得到照顾。在家庭制度下，如果儿童由父母抚养，资本家就不得不按照包含了儿童抚养费用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向儿童的父母支付工资。

养老问题则离得稍微远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或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养老是由部落、家庭作为生产单位承担的。除开那些极端困苦的原始部族外，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并不因为他们丧失劳动力而被家庭放弃，这是因为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已经能够满足老人的赡养了。否则，“孝”就成了不可能实现的笑话，就成了阻碍社会再生产的迂

见，而那些提倡孝道的社会就会在社会再生产的竞争当中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既然孝道能够在古代社会大行其道，可见养老在古代社会大概不是什么问题。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大可不顾老人死活，但工人不会答应，社会也不会答应。所以，对于养老问题，资本总是要被迫予以解决的，并能从解决中发现新的赚钱门道儿。

在各种家庭制度中，老人无非自己养活自己，或者依靠家庭养老。如果是家庭养老，那么，每个工人阶级都要从工资中支出一笔费用，用于自己双亲的养老。此外还需准备一笔资金，用于家庭可能的医疗支出。而他双亲的寿数几何，他却无法预期。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也就是他的工资当中便要包含这笔为他的双亲进行养老的费用，以及为了双亲未来疾病等情况预备的救急资金。

如果拆散这种家庭而采取核心家庭的制度，老人便与子女分居开，资本家看上去便把老人的负担从他的工资当中扣除了，实际上却并不如此。因为工人就要为他自己养老做准备了。如果是他自己养老，那么，每个工人阶级都要从工资中作一笔扣除用于储蓄，以用于自己未来的养老。而他自己的寿数几何，他却无法预期。这样，他便倾向于多储蓄一些，而资本家为了维持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也就要在工资中包含这样一笔被储蓄的费用。

总而言之，无论他自己负责自己未来的养老，还是他赡养老人，他总要从工资中做出这笔养老金的扣除，还要多预留一笔应对意外开支的储蓄，两种制度的效果是一样的。

由于人是无法确定他的寿命的，所以这种扣除和储蓄在大概率上总会高于他的预期生命，从而使得社会上的“消费”不足。毕竟，谁都不愿意“人还没死，钱花完了”。而工人又总是要按照他的日常消费和储蓄的总额，向资本家索取工资，从而他们由于需要储蓄向资本家所要求的工资就显得比这种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费用来得高。尽管这些储蓄有可能变成“投资”转入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中，充作资本的材料，但这并不是必然的，而它加重资本家的负担却是显而易见的。资本家便要绞尽脑汁地减少这笔开支，甚或开发些新技术，以便能够从中牟利。养老的社会化就是这个减支增收技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 二

今天的人们大多有个误解，以为自己在今天缴付的养老保险金就是未来社会向自己支付的养老金。如果是这样的话，哪里有养老金的所谓“缺口”呢？应当缴付养老金的那些老人在过去不都足额缴付了那些养老金吗？他们如果在过去按照比例交够了钱，为什么还会有空缺呢？在所谓养老金的制度当中，看过去好像是劳动者为了他自己未来的支出而预先支付一笔费用，然而事实上却不是如此。任何指向未来的费用只是构建了一个面向未来的社会关系，而不可能确切地对应什么实在现存的东西。任何货币总是对应着相应的商品，考虑养老金问题也应该将金额问题还原到实物消费品和服务中去，还原到社会总产品当中去。任何消费品和服务都是当期的：商品有保质期，存久了就要坏掉，而服务更是只能在当下提供。所以，一切流通中的货币只在用于消费当期的服务和商品时才实实在在地与消费品生产相联系，而社会的总消费品则是大致按照当期用于消费的货币进行分配的：工人总是用缴付养老金之后的实发工资余额来购买它当期消费品，而同期的老人则用他们领取的养老金购买他们当期所需的消费品。所以当期养老金的扣除只是使工人减少了当期的消费，并不意味着在将来按照这个数额用领到养老金购买相应份额的商品。除去资本家的消费外，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就要按照当期工人扣除后的工资余额总额和当期养老金发放总额的比例，分配给了当期的工人和老人。比如说，当期有 1 亿工人，有两千万老人。工人每个月工资 1 万元，上交养老金两千元。那么，养老资金每个月就会有两千亿的进账。这笔现金是被储蓄起来的，可以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这笔资金也就因此不再能够由工人用于购买当期的消费品和服务。如果当期的每个老人领取养老金 5000 元，全社会就会有 1000 亿的养老金发放，这笔养老金将用于购买当期的消费品和服务。那么，在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当中，当期的工人就消费了 8000 亿的份额，而当期的老人就消费了 1000 亿的份额，他们之间的消费品总价格之比是 1:8。如果社会总消费品是一块蛋糕的话，当期老人拿走了一份，工人拿走了八份。这个时候，每个月的养老金当中就会有 1000 亿的盈余，但这笔盈余并不用于购买消费品和服务。此时，如果社会再生产的各部门按照工资总额将消费品和服务投入市场，便要出现消费品和服务的过剩。

可以看看另一种情形。如果这时候社会上的工人是一个亿，而老人的数量增加到 4000 万，在其他情况不变时，这时候老人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是 2000 亿，和工人当期缴付的养老金数额相等。养老金刚好达到了盈亏平衡点，养老金和工人领取的工资数额就成了 1:4 的关系，当期的工人和老人就要按照 4:1 的总价格比例分配社会总的消费品。此时，如果社会再生产的各部门按照原有工资总额将消费品和服务投入市场，消费品和服务刚好平衡。

如果老人的数量增加到 6000 万，在其他情况不变时，这时候老人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是 3000 亿，养老金便出现了所谓的 1000 亿透支，养老金和工人领取的工资数额就成了 3:8 的关系，当期的工人和老人就要按照 8:3 的总



价格比例分配社会总的消费品。此时，如果社会再生产的各部门按照原有工资总额将消费品和服务投入市场，消费品和服务便要出现一定的供应紧张。

所以，当期养老金领取数额与工人扣缴的养老金数额应大致相等，才不至于对社会消费品和服务的供应造成影响。

当然，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例子。在不同的情形中，工人和老人总是按照当期的实发工资总额与养老金总额的比例分配社会消费品和服务的。因此，养老金是现收现付制的。所谓养老金的缺口，只是当期老人要消费的当期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所对应的养老金账目余额不足。今天老人在过去交付的养老金，只是按照过去赡养所需的产品份额对过去的收入所作的切割和分配。譬如，假设在 2000 年，劳动者平均要交纳工资的 10% 充作养老金，那么这至多只是意味着 2000 年的时候，用于消费的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中有 10% 要用于赡养老人，并不意味着这批劳动者在退休时能够领取任何份额的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他们在退休时能够占有的社会总消费品和服务的份额，将由他们退休时的总养老金发放数额和工人实收工资总额的比例决定。

以为自己现在缴费比例高，将来拿得也多？那属实是想多了。当期缴费比例高，只是因为当期老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比例高。你年老时拿到的是未来劳动者在工资中扣除的那份比例，那时候拿多拿少，只取决于那时候的养老政策。要不然，过去的劳动者都给自己缴足了养老保险，为啥现在还会有“养老金缺口”呢？

所以，从社会总产品上看，养老金都是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看上去是现在的自己保未来的自己，其实是当期的劳动者保当期的老人，只是推销时借助了市场条件下群众的自利心态罢了。

老人多了，原先定的比例不够了，就要使用各种手段解决问题。如果工资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那部分金额比例高一些，就能够养活更多的老人，使退休年龄相应地提前。然而这就要求提高工资，资本是不会答应的。他们总是要求降低这个比例、延长退休年龄，使他们购买的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同时使得大量还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作为产业后备军，进一步压低劳动者的工资。

所谓的延迟退休年龄并不是当期的工人被延迟了退休年龄，而是当期面临退休的那些接近退休年龄的工人不能够按时退休。延迟退休减少的是那些适龄工人领取退休金的份额。等到现在的工人年老之后，他们的退休年龄也将由他们那个时代的劳动者和被抚养人群分割社会总产品的比例来决定。

在“延迟退休年龄”问题上，这个退休年龄不是指失去工作能力或不再获得工作机会的年龄，而是能够从社会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延迟退休年龄，就减少了用于支付这批本该退休的老人用于养老的那笔费用，降低了社会总产品中由老人“免费”领取的份额。而这笔费用原先是应当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计算在工资总额当中的，并不“免费”。同样地，现在延迟退休年龄，针对的也只是当期即将退休的人群，减少这部分开支占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至于那些尚年轻的劳动者，他们的退休年龄将由未来社会的生产条件决定。

### 三

会有人问，我交养老保险时，国家或者保险公司不是承诺未来给付一定数额的保险金了么？然而，这个承诺并不与养老金的绝对数额挂钩，因为它要随着生活水平和物价水平的提高而适当提高。所以，与其说保险金是一定数额的金额，不如说是某种向未来的社会要求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

为什么会有这些社会保障或者保险呢？它们看上去是争取福利的结果，事实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为资本服务的。社会化大生产也使养老社会化了。养老社会化的效果在于通过统计学的大数定律确定人的平均寿命，这样就可以在社会层面上统筹养老支出，精确地“以支定收”，减少工人原先用于未来支出的储蓄，从而将工资压缩到最低限度。个别人的长寿或夭寿，并不能够影响社会在这方面的总支出。如果 60 岁退休，有的人活到 100 岁，有的人活到 60 岁，但社会保险或者社会保障就使得社会能够按照人的平均年龄来估算劳动人群和抚养人群分配社会总消费品的份额，从而使得用于消费的货币“物尽其用”，减少前文所说的超额储蓄带来的“浪费”，刺激消费，从而一面为资本家节约工资的发放数额，一面减少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发生的机会。如果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 70 岁，原先的工人总是按照较高的寿命预期进行储蓄，实际只活 60 岁的工人也要按照 100 岁的预期进行储蓄，从而要求按照包含 40 年退休时光的消费总额发放其劳动期间的工资总额。现在则不一样了，资本家只需要按照平均预期寿命支付包含 10 年退休时光消费总额的养老金和工资，并将养老金在社会层面上进行统筹，使现有的老人拿到足额的消费品，就能使现有的社会保持稳定，从而“节约”了工资支出。这样的统筹，也只有在金融资本足够发达的社会条件下才可以进行。养老金的统筹收支本身又增加了金融资本支配的货币份额，加强了金融资本的力量。当然，这笔钱也因此还可以离开消费领域，用于各种投资，继续充实“市场”的力量。

## 四

资本和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处在对立的两极。在社会总产品当中，资本的份额增加了，劳动者的份额也就相应减少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总是通过各种宣传让劳动者减少消费，挤出份额来增加他们的投资，充实他们的力量，好加大马力生产，挤垮竞争对手。劳动者参加的投资活动，只要不支配生产过程，自然丝毫不能改变资本支配生产的事实，也丝毫不能增强自身的力量，反而减少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进而限制了工资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加强了作为对方的资本的力量。你吃得少了，省吃俭用交给别人投资，壮大他们的力量，最终拿自己的生活质量给他们做了件好嫁衣。

资本多吃几口，对资本自身也并非全是好事。消费减少了，投资增加了，虚假繁荣、波动和危机也就来了。资本吃多了几口，最后的结果不外乎是社会消费总需求的减少、危机的爆发和小资本的破灭。当然，危机之后，资本的力量也会更加集中。

劳动者节衣缩食让资本吃了个饱，这样的好事，资本自然要绞尽脑汁设计一番，开发出不同的产品，天花乱坠地包装一下。此次“个人养老金”事实上也是这样的设计。个人养老保险支出再多，也不能确定与未来社会产品份额之间的联系，反而缩减了劳动者自己的消费，充实了资本的力量。

所以，劳动者在市场条件下的再生产，不过是资本再生产的手段。他们当牛做马若干年，培养子女继续当牛做马，交了一辈子养老金，老来想着颐养天年，却还要服从资本的差遣来填补各种“缺口”，充实资本的力量。其实，说到底，劳动者的一生在资本手里都只是算计和买卖的对象。

